## 南海及台海安全研究的觀察

#### 林正義

#### 本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本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

1982 年我自政大外交研究所畢業時,撰寫的碩士論文是〈美國、中國、台灣在 1958 年台海危機期間的三角關係〉。此一論文開啟了我在台灣海峽安全與美中台關係的研究。1987 年博士論文也是在此一範疇,不過重點轉向接近現階段的美中台關係,如 1979 年台灣關係法、1982 年八一七公報及 1980 年代台灣民主進程等議題。

自 1990 年代中期參與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起,陸續以東南亞區域安全研究為核心,探討官方第一軌道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及非官方第二軌道「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成立的背景、運作方式及其對區域安全對話的影響。由「合作安全」、「綜合安全」及「社群安全」的概念,分析「東南亞國協」如何成為主導東南亞安全對話協商機制的力量。

冷戰結束之後,東南亞安全體制產生了重大的變化。自 1994 年曼谷年會起,東協國家及其對話夥伴、觀察員的外長每年聚集東南亞舉行論壇年會,針對亞太安全議題交換意見、化解歧異並尋求共識。除了第一軌道官方的安全對話論壇之外,東協國家也大幅涉入由亞太國家戰略暨國際研究機構所組成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運作過程。

「東協區域論壇」的目標是藉安全對話網絡的維持,來緩和區域緊張。台灣並非此一論壇的成員,但台灣海峽安全絕對是亞太地區一個潛在衝突的熱點。北韓雖為「東協區域論壇」成員,但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卻需另闢「六方會談」,由美、中、日、俄加上南北韓,一起努力促使北韓放棄核武發展。「東協區域論壇」對台灣海峽更無解決衝突的能力,而是否能節制中國在南海主權爭端的作為,亦有待觀察。由於「東協區域論壇」對話功能大於無強制力的行使,大部分東協國家沒有放棄雙邊的安全協議,或加強與區域外國家——如美國、澳洲的軍事合作。若官方的年度「東協區域論壇」外長年會強制力不足,非官方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也只能扮演培養安全對話的習慣,並扮演「東

協區域論壇」智庫的角色。

台灣的官員無法參與「東協區域論壇」,但學者代表卻能以個人名義出席「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間接了解「東協區域論壇」及其機制所關切的議題。由1997年起,在政大國關中心「亞太安全理事會」中華民國秘書處邀請下,個人得以有機會名列台灣參與該理事的學者之一,並多次出席「北太平洋工作小組」會議,親身觀察運作情形。有關東南亞及亞太安全體系較為宏觀的研究心得,先後出版〈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1996a)及〈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1998b)。

在「合作安全」概念下具體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主要規範軍事領域的相關作為,如國防資訊透明化、軍事活動事先通告、軍事熱線裝置、軍事演習觀察。由於「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對此一措施的重視,我決定運用此規範性行為準則,探討對南海及台海地區安全可能發生那些影響。另外,在 1995 至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之後,柯林頓政府也鼓勵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因此,「信心建立措施」成為學術與政策研究的熱門議題。環繞以「信心建立措施」為主題的研究,個人先後出版七篇論文,包括:〈Taiwan's South China Sea Policy〉(1997);〈歐洲及亞太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之研究〉(1998c);〈東協區域論壇與南海信心建立措施〉(2000b);〈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Taiwan Strait〉(2001c);〈美國與中共軍事領域信心建立措施〉(2001b);〈十年來南海島嶼聲索國實際作法〉(2003);〈美國與台海信心建立措施〉(2005)。其中,Taiwan'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與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Taiwan Strait 兩篇論文出版地在美國,受到引用次數較多,尤其是,前者被收納入絕大多數有關南海研究的網站或上課教材。

在台海危機與安全部分,除出版《1958 年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1985)一書外,曾發表〈The U.S. Factor in the 1958 and 1996 Taiwan Straits Crises〉(1996b);〈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美國國會的反應〉(1998a);〈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後美國對台海的政策〉(1999a);〈The Security of Taiwan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vs. Congress〉(2000a);〈美國出兵台灣海峽及其限制〉(2001a);〈The US Role in Taiwan-China Security Relations〉(2001c);〈The Tacit U.S-Taiwan Military Alliance and China's Perception〉(2001d);〈China, the US,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2004)等論文。其

中,由於長期對美中台關係的研究,得以有機會參與「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在 2001 年完成的「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亞洲觀點」(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Views)計畫。

在台海安全研究部分,我在 1958 年台海危機、1996 年台海危機的研究基礎上,正進行 1962 年台海危機的研究。1962 年,蔣介石藉中國大陸局勢不穩,有反攻大陸的準備,此一被稱之為第三次台海危機的事件在學術研究的能量上一直受到忽略。然而,美國與中國在沒有外交關係之下,聯手阻止美國盟友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與現階段美中兩國共同反對「台灣獨立」,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外,2003 至 2004 年,因借調服務於國家安全會議,就近觀察美中台因「防衛性公投」所牽引的複雜緊張關係,並完成相關論文〈Chen Shui-bian's Referendum and Taiwan-US Relations〉一篇。

相較於前述東亞安全環境、台海安全及南海「信心建立措施」與危機處理的研究,我在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個令人滿意的系統與累積性。1980年代末期,因美國文化研究所(歐美研究所前身)編輯中美關係專題研究的需要,曾先後針對〈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美國與中共人員互訪紀錄與分析〉〈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中美政治軍事關係演變〉,整理歸納美中關係的實質進展情形,並發表於《中美關係報告》(1989a、1991)。另外,重大的戰爭或事件對美中關係通常帶來長遠的影響,因此,先後出版〈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1989);〈波斯灣戰爭對中美關係的影響〉(1993);並完成探討九一一事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一文〈The Implications of September 11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進入 21 世紀,美國與中國關係的重要性,漸有等同於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關係的比重。經由網路資料蒐索及運用分析,出版〈美國智庫與中美關係:網際網路的檢索〉(1999b)一文,並針對美中在第二任柯林頓政府所要建立的長期穩定關係,撰寫〈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出版於《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8-2000》(2002)。最近一篇論文〈中美軍機擦撞事件與布希政府危機處理〉探討小布希政府上台所面對的第一個外交政策危機即將出版。

由於台海安全研究牽涉國際關係理論、政策實務運作,研究範圍環繞在「信心建立措施」、南海安全、台海危機等。若沒有實際了解政策,討論這些問題的方法勢必會有所侷限,一旦親身參與實務,所涉及的業務又多與機密性有關,

#### 150 亞太研究論壇第三十一期 2006.03

在出版上將多所限制。台海安全研究雖非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的發展重點,卻是亞太研究無法忽略的一環。基於過去對東南亞安全體系、南海安全、台海安全的研究基礎,日後將著重東北亞安全的研究,尤其是美國與日本安保、朝鮮半島安全等議題的探討。在台海安全研究部分,將陸續補齊 1962 年台海危機及其之後越戰對美中台關係影響的探討。

## 相關著作目錄

- 1985。《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台北:商務印書館。
- 1989a。〈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美國與中共人員互訪紀錄與分析〉。收錄於《中美關係報告:1985-1987》,頁 169-193。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1989b。〈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研究》,19(4):81-122。
- 1991。〈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中美政治軍事關係演變〉。收錄於《中美關係報告:1988-1989》,頁1-40。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
- 1993。〈波斯灣戰爭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收錄於《中美關係報告:1990-1991》, 頁 117-140。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1996a。〈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 35 (12): 1-18。
- 1998a。〈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美國國會的反應〉。《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5-1997》,頁145-183。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1998b。〈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第 23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 1998c。〈歐洲及亞太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之研究〉。《理論與政策》·12(3):74-94。
- 1999a。〈「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後美國對台海的政策〉。收錄於《政治科學論 叢專刊》,頁 105-126。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 1999b。〈美國智庫與中美關係:網際網路的檢索〉。《戰略與國際研究》,1(1): 106-131。
- 2000a。〈The Security of Taiwan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vs. Congress〉。 《國防政策評論》,1(1)。
- 2000b。〈東協區域論壇與南海信心建立措施〉。《戰略與國際研究》,2(1):21-55。
- 2001a。〈美國出兵台灣海峽及其限制〉。收錄於裘兆琳主編:《後冷戰時期美國海外出兵案例研究》,頁 229-271。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2001b。〈美國與中共軍事領域信心建立措施〉。收錄於鄭宇碩主編:《邁進 21

- 世紀的中國外交:前瞻與回顧》,頁57-80。香港:天地圖書。
- 2002。〈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8-2000》,頁1-36。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2003。〈十年來南海島嶼聲索國實際作法〉。《亞太研究論壇》,19:1-11。
- 2005。〈美國與台海兩岸信心建立措施〉。《問題與研究》,44(6):1-28。
- 1996b. The U.S. Factor in the 1958 and 1996 Taiwan Straits Crises. *Issues & Studies*, 32(12): 14-32.
- 1997. Taiwan'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sian Survey, 37(4): 323-339.
- 2000c. The US Role in Taiwan-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156: 43-66.
- 2001c.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Taiwan Strai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3(2): 78-89.
- 2001d. The Tacit U.S-Taiwan Military Alliance and China's Perception (co-authored with Ji You). Pp. 109-139 in *Alliance Tomorrow: Security Arrangements after the Cold War*, ed. Yoichi Funabashi. Tokyo: Tokyo Foundation.
- 2004. China, the US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 Asian Affairs, 23: 33-46.

## 從近代到現代: 我的日本研究之路

### 黄自進

####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

以「人物研究」為主題,探討近現代的中日關係,是本人在本院近史所服務以來,一直積極耕耘的研究領域,前後曾研究四位近現代史上的代表人物。依序為「吉野作造」、「北一輝」、「林金莖」、及「蔣介石」。

四位代表人物中,前兩位是日本籍、後兩位是國人。研究的角度,也因探討的焦點不一,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吉野作造」是日本大正時期(1912-1926)的民主理論先驅,對他的觀察重點,在於探討他的中國觀形成與變遷,他的民主理念成型與反日本政府帝國主義侵華政策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他在日本政論界的崛起與沒落,與其反映出日本近代政治思潮的演變。吉野判斷中國情勢有三大考慮:(1)何股政治勢力應被視為是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心,(2)日本對中國實施以掠奪利權為主旨的帝國主義政策是否合乎理性,(3)中國國民是否有政治獨立自主的能力。對吉野的研究,也以呼應這三大要素為原則,選定他對中國革命,二十一條要求,及五四運動的看法為研究主軸。

「北一輝」是戰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導師,同時,早年他又曾投身中國革命運動,是中國革命秘密組織「同盟會」的正式成員。對他的研究焦點,則是以他這一段曾奔走中日兩國革命運動的離奇生涯為主軸,分析他早年與中國革命的淵源,以及他從反對日本對中國實施帝國主義政策,到晚年倡導軍國主義期間的思想矛盾,並循此一線索以中日兩國政治情勢變遷為經、北一輝個人政治思想變動為緯,探討北一輝對中國革命態度的前後不一,所凸顯出的時代意義,以及大亞洲主義內涵在日本的演變。

「林金莖」是我國前駐日代表,研究的方法則是以林金莖從事對日外交四十餘年間的工作經歷為訪談焦點,除了記錄林金莖與日本朝野折衝樽俎之過程,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日兩國關係,從邦交到斷交,從斷交到實務外交之曲折轉變,提供歷史見證。

蔣介石一生的史事,與中國近代史密不可分,也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重要的一頁。1906年蔣介石以十九歲弱冠之年遠赴東京深造,此一舉動不僅展現

出蔣對近代文明的仰慕,也間接的表徵出當時的時代風尚。他認為以傳統的中國文化,已不足以抗衡西方文化,中國惟有以日本為師,借重日本吸取西方文化的經驗以謀國家改造,才可避免有亡國亡種之虞的想法,已成為當時憂國志士的共同體認。這份自覺觸動了東瀛留學熱,也啟動了蔣遠赴日本留學的決心。

既然國家政策已轉成以日本為師,這也使得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日本的影響無所不在。此一時代背景,落實到蔣的生涯,可見蔣的一生事業皆與日本息息相關。東瀛留學之旅,是蔣加入革命陣營的關鍵,而留學生的學生生活,是他近代文明知識的奠基,尤其是在日本所培養的軍事素養,使他在往後的戎馬生涯中,建立起撥亂反正的不世軍功,更進而能一躍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原由之所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也是日本的大正三年,日本開國元勳井上馨稱這次大戰為「大正新時代的天佑」。天佑使日本成為協約國軍需品的供應者,也使日貨取代了歐洲產品在中國及其他亞洲地區所擁有的市場,這些商機解決了日本財政因日俄戰爭期間所帶來的龐大外債,以及連年赤字貿易所面臨的破產危機。使日本從國際上的債務國轉為債權國。經濟上的獨立發展,無疑地加強了日本推展帝國主義的雄心。1915 年的二十一條要求,展現出日本有鯨吞中國的野心,同時也揭露出日本已自認有排除所有西方勢力而獨霸中國的實力。

日本的國家政策既然已定位於鯨吞中國,當然會迫使以追求中國國家主權獨立為已任的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視日本為主敵。這也使得 1926 年蔣介石先後出任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後,在實際擔負中樞責任之同時,他與日本的關係自然成為一部抵抗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獨立自尊的抗爭史。

1943 年蔣介石應美國總統羅斯福之邀,出席開羅會議,這是國民政府繼解除不平等條約以後,在爭取國家主權獨立及生存空間上的另一外交上的重大建樹。開羅會議中,確立中國收回東北四省、台灣、澎湖主權以外,也因蔣介石的建言,日本的天皇制才得以保存。天皇制的存續以及蔣介石對日本的「以德報怨」政策,可謂是建構戰後日本經濟奇蹟的兩大支柱。戰後日本的再起,不僅是有關日本國民的福祉,也是西太平洋地區能夠免於赤化的重大關鍵。是以,蔣介石的高瞻遠矚,替中日兩大民族拓展國運開創未來,提供了無限可資合作的利用空間。

蔣介石一生的學習,一生的事業以及終極一世的遺產,既然皆與日本息息

相關。他畢生的志事,自然是兩國交往實況的最佳寫照。對蔣的研究,首先是探討早年日本的學習經驗對他人格成長的具體影響。其次是解析九一八事變以後,他的對日戰略以及備戰工程。尤其是他利用「安內攘外」之名,實踐他的「消滅中共」、「削減地方勢力」、「迴避對日作戰」的備戰三部曲經緯,以及「蘆溝橋事變」之後,他利用日蘇矛盾,在第一時期內為中國爭取到大量的蘇聯軍事物質援助以外,又因充分掌握日本防蘇心理,能精確預測日本在中國戰場可資調度的戰力,為中國長期抗戰奠下良基之過程。最後,再以他所倡導的「以德報怨」為研究線索,探索抗戰結束前後他的對日態度。其中,特別以他所規劃的戰後遠東國際秩序架構下,中日合作在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的近程計畫、對抗國際共黨勢力擴充的遠程計畫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為探討重點。

藉由教科書問題及戰後日本外交之研究,掌握今日日本社會動態,是本人自 2003 年加入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的分支計畫以後,開始拓展的新研究領域。

一本挑戰現有教學內容,由「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所編纂的教科書,竟然能通過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審查,成為中學生的歷史教材,自然是代表日本民心思變的最佳指標。教科書的研究,讓本人認識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重建社會道德價值體系之訴求,和日本輿論界再造日本之要求相互呼應,相輔相成。正由於教科書的訴求,能得到社會的共鳴,因而教科書問題,不僅是學校的教育問題,甚且演進成社會運動。

除了教科書問題以外,另一能反映日本民心思變的指標,無非就是修憲運動。日本認為應該打破戰後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思想枷鎖,修改所謂憲法第9條中有關「放棄使用武力」、「不保持軍備」的條文限制,可謂是當前日本政壇的最熱門話題。

當爭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已成為今日日本外交首要課題之際,修改憲法讓日本有充分軍事力量扮演政治大國的角色,也自然成為今後日本政治的必然走向。為了更能理解當前日本的憲政辯論,以及修憲議題蘊含的戰後 60 年來日本政治及社會變遷的時代容貌,本人特以「和平憲法」下的日本外交為題,以回顧戰後日本外交演變為線索,對日本為何會從擁戴「和平憲法」體制,發展到告別「和平憲法」體制,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的省思。

## 我的區域經濟研究

### 黄登興

#### 本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本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

傳統的貿易理論,從技術面的差異(如 Ricardian Model),或資源稟賦的角度(如 Heckscher-Ohlin 模型,簡稱 HO 模型)來解讀何以貿易會發生,貿易型態如何。這些古典的貿易理論,一直是國際貿易學的主流,也都根源於 18世紀 Adam Smith (1776 年之原富論)。 David Ricardo 在二十多歲讀了「原富論」而得到啟發,從而在 1817 年英國國會中,當時以國會議員的身份,提出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之理論,反對保護農業部門之 Corn Laws。雖然未能阻止該法案的通過,其「相對優勢」的原理,則成為古典貿易理論的濫觴。相對優勢的根源,有技術差異而來者,有資源稟賦不同而來者,前者為Ricardian Model 之根本假設,後者則為 HO 模型所關注。晚近到了 1980 年代所謂的「新貿易理論」則強調大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強調即便是技術與資源稟賦一模一樣的兩個國家,在製造業具有大規模經濟特質的前提下,仍舊有貿易而雙邊獲益的空間;當然這一發展又回到 Adam Smith 所強調之市場規模擴大,促進分工而使雙方獲益的觀點。

這一系列的貿易理論之發展,基本上無所謂區域經濟研究的課題;蓋凡是涉及雙方面之交易者,無論是國內、跨國抑或是跨區域,都是貿易理論所涉及的範疇,也都可以從技術差異、資源稟賦或大規模經濟的三個面向來解析。不過,若仔細思考,所謂「比較優勢」是針對參與貿易之雙方而予以定義,換言之,當我們認定某國出口某一產業之產品,如紡織品,其背後之理論基礎,是該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各國」或相對於其貿易對象而言,他在紡織品的製造上有比較優勢。問題是,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是其貿易對象,文獻中習慣於本國與其他各國的「兩國」假設,其實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區域經濟的研究課題,於是有了存在的價值與空間。

具體而言,我們在談論一國之貿易或經濟上的比較優勢何在時,應該先確 認其主要貿易對象為何?往往貿易對象改變了,(可能是政治因素,如被殖民地 位,如軍事衝突的結果)其貿易的型態也跟著變化。我在〈殖民關係與貿易形 態在台灣日據時期的驗證〉(1997)一文即是一個例子,我在該文強調因為殖民 地關係,其商權因為殖民宗主國的強勢介入,使得台灣的貿易對象,由清末以 全球為對象,轉變而成為只侷限於對日本的貿易;因此,當時台灣之具有比較 利益之貿易產品內容,當然是相對於日本經濟而言。

我們看待中國大陸 1980 年代以來的對外開放,其所帶來之貿易型態的衝擊,原理亦然。我們在研究東南亞的貿易與其相關之經濟發展的課題上,也都可以同理「一以貫之」。在「東亞出口競爭對象的更迭」一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 1980 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加入世界貿易舞台,以致東亞各國在國際貿易比較優勢上的大幅改變。

這又進一步讓我們聯想到,GATT/WTO 以全球貿易自由化為宗旨,卻未能真正達到全球自由貿易的目標。相反地,在全球化的旗纛下,幾十年來就一直存在著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或努力,亦即所謂的區域(經濟)主義(Regionalism)。我在〈Trade Blocs under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ravity Model〉一文即是著眼於這個觀點,從貿易資料提出證據。這一經濟合作或貿易的區塊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因而區域經濟研究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大。

基本上我的研究仍舊是屬於國際貿易的範疇,只是在配合本亞太研究中心的研究上,則從區域性跨國分工的角度來切入。所以下面所附上的著作都與這個研究方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連性。當然,從這類貿易區塊化的研究,如何找出屬於亞太特色的新貿易理論,一直是學術上值得探究的方向。 大抵而言,從區域研究的角度來看,亞太地區的區域內貿易現象,與區域間的貿易型態,其不同的根源,難以用傳統的貿易理論來詮釋,值得我們更深入的探討。

## 參考書目

- 黃登興。1998。〈從台灣的經貿角度看東協卅年的發展與前景〉。《東南亞經貿雙月刊》,69:1-7。
- -----。1999。〈東亞出口競爭對象的更迭:1980-1998年間實證分析〉。《自由中國之工業》,90(8):1-30
- ——。2000a。〈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東南亞與台灣的經貿發展〉。收錄於蕭新 煌主編:《東南亞的變貌》,頁 326-358。

- ———。2000b。〈雁行產業發展模式在東亞地區的驗證〉。《東南亞區域研究通 訊》,12:6-29。
- 黄登興、徐茂炫。1997。〈殖民關係與貿易形態在台灣日據時期的驗證〉。《經濟論文叢刊》,25(3):369-399。
- 2002。〈東亞區內產業分工對台灣經濟之影響〉。《自由中國之工業》,92(1):1-86。
- 黄登興、張靜貞。2000。〈區域內貿易結構與經濟依存關係:臺灣與東亞實證分析〉。《自由中國之工業》,90(11):1-48。
- 黄登興、黃幼宜。2006。〈兩岸三地的經貿分合:引力模型的驗證〉。《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36(2):47-72。
- Huang, D. S. 2002. Trade Blocs under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ravity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Dhaka, Bangladesh., December 18-22.
- Huang, D. S. 2003. Trading Blocs in East Asi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ravity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Annual East Asian Seminar o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Trade, Taipei, Taiwan, September 5-7.

## 海洋貿易與社會的形成及再生產: 台灣、蘭嶼和島嶼東南亞的人類學比較研究

#### 蔣斌

#### 本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本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

作為一個人類學者,我的學術工作始於南台灣的排灣族以及蘭嶼達悟(雅美)族的研究。眾所周知,台灣以及蘭嶼的原住民族,在語言文化上,屬於南島民族的一部份。在對於排灣族貴族制度以及雅美族家屋宅地繼承的研究中, 我深刻體認到,要真正了解台灣以及蘭嶼的南島社會,必須將他們放在更寬廣的包括大洋洲與島嶼東南亞的南島民族整體的脈絡中,才能落實。

台灣是南島民族分布的最北端,在地緣上緊鄰島嶼東南亞。但是,和島嶼東南亞相比,就歷史發展而言,台灣和蘭嶼具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台灣及蘭嶼的南島民族在接觸華人移民以及基督宗教之前,並未受到來自中東(伊斯蘭)與南亞(印度教與佛教)的高等宗教以及王權宮廷儀節的洗禮,因此沒能像島嶼東南亞的原住民族一樣,發展出具有一定規模與格局的政體;(二)在人數佔絕對優勢的華人殖民政權統治下,台灣及蘭嶼的南島民族在當代國家體制以及市場經濟中,均居於劣勢,和島嶼東南亞華人的經濟優勢、土著的政權支配地位,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兩點對比,使得台灣、蘭嶼以及島嶼東南亞南島民族的比較研究,對於人類學許多理論議題的探討,具有無窮的意義。

在文化表相上,由於缺乏系統宗教與王權的洗禮,台灣及蘭嶼的南島民族,似乎與島嶼東南亞的諸多社會南轅北轍,聲氣不通。但是,如果由「階序」與「價值」的分析切入,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深層的比較基礎。歷史與人類學對於島嶼東南亞的研究,具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強調上千年海洋貿易對於地方社會形成的重要影響。台灣在這個具有長遠歷史的海洋貿易網絡中,可能並不居於樞紐的地位。但是,就以具有社會階序體制的排灣族與平權的達悟族為例,這兩個族群的物質文化清單中,都包含大量的外來寶物,包括琉璃珠、瑪瑙珠、銅器、銀飾等,品類和廣泛流傳在島嶼東南亞地區者,大同小異。但是排灣族與達悟族對於「家」的不同觀念,導致具有價值的外來寶物,依循不同的機制累積、流傳或者分散,進一步影響了階序或平權社會體制的形成。這樣對於外

來物品價值的認定,以及外來寶物在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在島嶼東南亞地區,也有許多對比鮮明的例子。例如同在砂勞越且彼此鄰近的伊班族(Iban)與加央/肯雅族群(Kayan/Kenyah),前者為民族誌上著名的平權社會典範,後者則為高度發展的階序社會,而兩者的差異,同樣與外來寶物價值與意義的構成、認知,以及寶物的獲取、累積、流通機制,有密切的關係。

我目前以及未來近期內的研究重心,仍然在於釐清台灣、蘭嶼以及島嶼東 南亞跨族群貿易、外來寶物流通機制、價值與意義的形成、與社會生產與再生 產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的主題,希望檢視具有長遠歷史的島嶼東南亞海洋貿易, 在資本主義擴張之前與之後,乃至當代,在區域連結與全球化連結的結構上, 有何種的變異與延續。

## 「殖民地台灣與朝鮮的地方自治: 日本殖民行政的比較研究」分支計畫簡介

#### 蔡慧玉

# 本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在臺灣和朝鮮地方自治的比較研究上,本人試圖提出以下假說:在臺灣和朝鮮兩個殖民地上歷次所實施的「地方改正(革)」實際上使得兩地的「地方自治」的自主性大幅縮水;換言之,地方改正實質意義在於帝國內的政治整合。在本研究中,我將檢視、分析並比較1919年以後日治下臺灣和朝鮮的「地方自治」,以期進一步理解日本殖民帝國歷次重要「地方自治」的實務和理論。兩殖民地本質上的差異性的探討不可避免地就牽涉到日本統治臺灣和朝鮮等一系列殖民理論、殖民論述、論述理論、殖民論述分析、論述的應用,以及後殖民批判和後殖民理論的建構。

朝鮮和台灣在大正九年(1920)同步實施有限度的地方自治;該制重大修正的年度在朝鮮是昭和五年(1930),在台灣則是昭和十年(1935)。兩個殖民地在這個制度改革上都有一些共同點,當然也有相異之處;其共通點必須和日本本土的地方制度做比較,才能突顯日本殖民行政的特質,而其相異之處正好可以用來理解日本兩大殖民地在中央政府的定位。本計劃的觀察重點包括:同化(或整合)水平、序階(重要性)以及進化程度(內地化的時間表);同化的主要變數包括種族、語言和文化,序階的主要成立條件為殖民地相對於母國的地理位置、人力和經濟資源,而「進化」程度則必須分別從「現代化」、「同化」和「治理化」三個層面觀察。在平時,這「三化」就是社會動員的既定目標;到了戰爭時期,社會動員轉化為總動員。

朝鮮和台灣在1920年實施的有限度地方自治<sup>1</sup>顯示了日本中央政府所做的妥協,同時也襯托出兩殖民地在地方自治上的微妙對照。日本殖民行政的重點始終不脫同化政策,而此一政策又被殖民行政官員用來合理化其殖民統治,其理由乃是:文化上的同化為政治和經濟同化的先決條件。此一文化同化政策

<sup>1</sup>朝鮮在1930年修正該制,而台灣則在1935年修正。

和殖民發展政策息息相關,而發展政策自殖民統治之初就是殖民政府致力推動的重點目標。以殖民地朝鮮而言,日治朝鮮一個重要的政策面向就是引用朝鮮本地人進入殖民地官僚體系。在日本併吞朝鮮以後,朝鮮人的政治參與和進用之途幾乎只有官僚體系;任何想進入殖民政府決策機制的朝鮮人都必須通過官僚體系用人制度的篩選,而事實上這也是當時唯一的管道。朝鮮人在殖民政府的決策結構中雖然沒有正式功能,但他們在朝鮮的殖民行政中仍然扮演了某些有限的角色,而這個有限的角色正是吾人比較臺灣和朝鮮殖民行政的關鍵所在。

日本在殖民地所推行的「自治行政」在素來備受批判,被譏為「偽自治」、「假自治」。雖然如此,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治行政」仍有很大的空間極待詮釋和釐清。這個議題雖然目前已累積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環繞在很浮面的自治口號上打轉,形成殖民和反殖民的二元論述。事實上,「官治行政」的內涵遠比我們目前所了解得要來得多元、複雜和抽象,不但與殖民地各階段的「同化」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社會動員息息相關,而且關係到兩地殖民遺緒的分析以及殖民地的比較研究。以「地方自治」為例,總督府和當時的「官治行政」當然是主流論述,「偽自治」、「假自治」則為一種反主流論述。本人主張,一旦這些論述被工具化、抽象化,乃至成為合理化殖民或反殖民統治理論架構中的一環時,該論述就有可能被還原到歷史情境中,乃至被轉化為「論述理論」,從而將歷史詮釋予以工具化。因此論述分析也是本研究嘗試觀察的另一個面向。

# 「貨幣圈與亞洲國際經濟秩序:1930年代橫濱正金銀行為中心的觀察(1929-1943)」分支計畫簡介

#### 李宇平

#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集團經濟風起雲湧之際,1930年代國際金融界最顯著的特徵之一,表現在 金、銀兩大貨幣圈的動向。中國是亞洲,也是世界唯一的銀本位國。亞洲以中 國為中心的銀貨圈,以及幾乎與殖民母國金幣相聯結的南亞、東南亞殖民地國 貨幣圈、1931年廢除金本位制並實施金匯兑本位制的日本貨幣圈,各擅勝場, 呈現分裂的局面。1935年前,中國實施銀本位,其對外匯率因國際銀價相對於 金價之急劇上漲,節節升高。緬甸、泰國、印度這些英美殖民地貨幣的幣值, 相對於金貨圈及英鎊,呈不變或上升的走勢。中國對這些英系殖民地貨幣的幣 值, 隨之水漲船高。另方面, 日本於 1931 年放棄金本位後, 日圓幣值大幅下跌, 日幣相對於英匯走跌約 48%,相對於印度、緬甸、泰國、印度的幣值,自然呈 現跌落的局面。日圓與中國銀元相比大幅低落 150%上下,更是高下懸殊。換 言之,日圓貨幣圈的對外匯率,漸漸高於英系金貨圈的對外匯率。中國銀圓貨 幣圈的對外匯率不只高於英系金貨圈的對外匯率,且更高於日圓貨幣圈的對外 匯率。本計畫試圖說明,1930年代中國對外貿易條件趨向惡化,且當各國進口 貿易因經濟恐慌而趨於縮小之際,中國的進口貿易,特別是東南亞、南亞及日 本對中國的進口貿易,反而逆向擴大,致中國總體貿易收支呈現逆差。這一現 象的造成,主要導因於,中國的銀幣不敵以金幣相聯結的兩個集圈經濟圈的經 濟擴張。本計書因因擬討論 1930 年代集團經濟時期,亞洲金、銀兩大貨幣圈的 動向。

由於橫濱正金銀行有許多分支行分布在中國、亞洲及世界各地,且留存大量檔案資料,本計畫因擬以該行為中心,對 1930 年代亞洲的貨幣現象,進行若干觀察。

## 「地方領導權與殖民歷史:反思美拉尼西亞「bigman」 類型與權力」分支計畫簡介

郭佩宜

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 一、計畫摘要

本研究就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以及區域內其他族群的領導權 (leadership) 做歷史民族誌的探討,檢視殖民時期(19世紀到20世紀中)當地權力結構,與殖民經驗之間的關係。筆者要探究的問題是: bigman 是歷史過程 (historical process),還是社會分類?

Langalanga可追溯的歷史中重要的領導人物有幾種類型,部分是以儀式能力(fata aabu)、作戰能力(ramo)為主,部分為類似Melanesia bigman¹的類型(wale baela),藉由分配資源,獲取聲望,與一群人形成人情利益的共同體;近年則有政治人物及生意人,以及而當地人改宗信奉基督後,教會的領導者也扮演重要角色。特殊的bigman類型的領導權研究一直是大洋洲區域研究的重要議題,美拉尼西亞紛盛的差異性,也讓這方面的研究持續活躍。新近的美拉尼西亞研究指出,bigman可能未必是美拉尼西亞平權社會相對於玻里尼西亞階序社會「頭目」(chief)(Sahlins 1963)的社會文化本質,反可能一定程度是與殖民政權接觸後的產物,而Langalanga的例子似乎傾向支持這個觀點,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瞭解殖民經驗與地方領導權性質轉變之間的關係。Langalanga特殊的貝珠錢製作經濟型態,對於其bigman領導權的運作與其他美拉尼西亞社會有何不同,也是研究的課題。此外,透過就Langalanga幾種領導類型做比較,筆者也擬進一步探討領導者不同性質權力(power)的來源(包括武力戰爭、儀式、知識、聲望、經濟和政治等),當地對權力的觀念,以及概念間的轉換。由比較長的歷史脈絡來研究,能讓我們更瞭解在與外來人群歷史互動過程中當

<sup>&</sup>lt;sup>1</sup> Bigman在中文沒有相對應的詞彙,或譯爲「強人」、「大人物」,但意義有些出入,另外本文稍後提到的另一個類型「great man」也缺乏對應詞彙,故在此兩者皆暫不翻譯。

地領導權的轉變。

## 二、文獻回顧

關於大洋洲領導權(leadership)的研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 Marshall Sahlins 在 1963 年的文章「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該文主要區分了兩種領導權/政治類型:階序的玻里尼西亞以頭目(chief)為主要領領導類型,而美拉尼西亞則相對平權,主要領導類型為「bigman」。頭目是世襲的頭銜,出生即決定(ascribed),而 bigman 則否,主要由個人成就取得(achieved),透過個人能力與個人特質,經由交換、分配、說服等手段,吸引一群跟隨者。這樣的二分後來受到許多挑戰,主要批評在於截然的地理區對應劃分,靜態模型、混淆了理想型(ideology)和實際運作(practice)(Douglas 1979)、以及是否只有這兩類領導權等。

1980年代對 Sahlins 挑戰的重點轉移到更細緻的權力來源區隔,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 Maurice Godelier (1986),更進一步將美拉尼西亞的領導類型區分為 great man/bigman,前者社會主要交換類型為同等(equivalent)的交換(即人一人),而後者則是透過不同等的(non-equivalent)交換(即人一物)。此分類在新幾內亞內陸社會具一定的準確性,揭櫫的不同交換原則也有開創性,然而也受到許多挑戰,除對 great man 到 bigman 的演化次序、交換原則和「equivalence」概念的質疑外,多數指出在文化紛雜的美拉尼西亞社會有多樣的領導權類型,不盡然能如此簡化分類(e.g. Godelier & Strathern 1991 eds.)。

bigman 在人類學界成為標誌美拉尼西亞的領導權類型,是經過漫長摸索的過程(Lindstrom 1981)。作為分類標籤,bigman 一詞後來含括太多種權力形式和來源,許多學者重新反思大洋洲的領導權的種類與性質,而非落入二種(chief/bigman)或三種(加上 great man)分類之中,有些人則回歸更細緻的當地概念來討論。例如 Keesing (1985)分析 Kwaio 社會的三種領袖:戰士、bigman 和祭司;Feinberg(2002)回歸領導權的「元素」(elements)來檢視Anuta 人的領導權應如何被理解。Lindstrom(1984)和 McKeown(2001)則探討經濟以外(cf. Lederman 1990)新興的權力來源,此外也有學者注意到女性的角色(Lepowsky 1990)。Mosko(2004)與筆者(2004c)則分別針對討論領導權類型時常見的 ascribed/achieved status 二分原則進行解構與再建

構;Mosko 主張所有的 ascribed status 在 Mekeo 社會都是 achieved status,而筆者則認為 ascribed 和 achieved status 具轉換關係,需以動態過程來理解,此外前者需要透過後者來「再續」(renewal)。

延續於上述的學術脈絡,筆者主張回到細緻的民族誌研究,重新檢視領導權的差異和權力基礎,且在處理領導權時對相關的文化的概念需要有更大的敏感度,才可能有新的進展。在本研究中,筆者即計畫處理當地人對「財富」的概念,尤其是因為 Langalanga 人生產地方貨幣(貝珠錢),他們對於交換、財富的看法與其他族群或有差異,值得細察。

針對領導類型的研究與反省,筆者認為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地方,在於指出過往研究中忽略了歷史面向,尤其是歐洲殖民在大洋洲的影響。研究者看到的多種領導權類型,無論是並存或有粗略的區域分佈對應,都可能只是持續變動的過程,在研究當下時暫時被凍結的快照罷了。例如 Schwimmer (1991)、Liep (1991)都指出,在殖民政府進入後,許多 Melanesia 社會有 big-manization的現象,Liep (1996)更直接指出殖民經驗催化了 bigman 領導權類型在區域內的與起。因此將「bigman」當成一個靜態的類型是否恰當,是本研究希望能再檢討的;將 bigman,甚至 chief 視為歷史過程,而非社會分類,在相關研究中仍是值得開發的理論課題。

另外,從區域研究角度,所羅門群島位於島嶼美拉尼西亞是南島語族與非南島語族的交會地,有多種領導類型——包括(傾向)階序與(傾向)平權社會——並存(Scaglion 1996),與過往 bigman 系統討論的核心區域(新幾內亞內陸)有很大差異,或能對此課題提供不同的視角。Malaita 島過去的民族誌研究也顯示這樣的特色(Keesing 1985)。被認為與 Langalanga 人有類似生態環境和生計型態的 Malaita 北部的 Lau 人是階序社會,而 Langalanga 人卻是平權社會,原因為何頗值得探究。將殖民經驗的重要性帶入研究、重新思考這個區域的領導權結構,在美拉尼西亞區域研究中是值得嘗試的課題。

## 三、研究背景

筆者研究的 Langalanga 人居住在所羅門群島的 Malaita 島西側海岸地區,其經濟來源極仰賴製作、販賣區域內流通的貝珠錢,也是經過殖民時期後,目前唯一仍持續此型經濟型態者 (Guo 2002a, 2004a, 2004b)。

筆者將 Langalanga 人的領導權與領袖類型分成三個時期:殖民前與殖民

初期、 殖民時期,以及後殖民的當代民族國家。古老傳說中(Guo 2004c)的重要的領導人物主要有三類:聚落、氏族的開創者(wale eta'ae)、祭司或儀式專家(fata aabu)、以及戰士(ramo)。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口述歷史中,筆者尚未發現美拉尼西亞的 bigman 型領袖,然這項觀察仍須更多田野訪談確認到底是 bigman 完全不存在,還是角色在歷史敘事中隱而不顯?

殖民時期的核心人物則是 bigman,筆者先前研究發現,他們善與殖民政府打交道,作為中介者,同時也往往是 businessman,但具有美拉尼西亞常見的 bigman 那種慷慨(甚至競爭性)、贈與、累積人情債的特質,與先前的戰士、祭司等截然不同。這個時期是否經歷了領導權的性質轉變?與殖民經驗的關連為何?這是筆者在計畫中擬研究的重點。

當代美拉尼西亞社會持續並與起呈現多種類型的地方領導人物。殖民主義同時帶入了資本主義的觀念與操作,當代社會中 bigman 漸次減少,轉型為兩類:一為政治人物(politicians),與之前 bigman 一般,以分配資源,與一群人形成人情/利益的共同體,這樣的特質尤其顯現在國會議員選舉,以及政府官員和其「one talk」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上。另一類則為生意人(businessman),專注於自身和家族的利益。其中 big-man / businessman 牽涉到對 wealth 的不同處理態度與方式。前者將財富轉換為聲望:以慷慨的誇富宴會、付出鉅額聘金等方式來達成;後者則為許多當地人所微詞,認為其「自私」,與過去的 bigman 無法比擬。原先的 bigmanship 文化,一定程度壓抑生意人的資本主義。因此,我們想瞭解當代地方領導權的運作,以及當地人對領導者以及一般人之間關係的理解,必須先釐清殖民時期 bigman 的與衰、運作模式與權力來源,才有可能對當代美拉尼西亞的政經運作——尤其是政治人物和生意人兩項要角——有深度的瞭解。

## 四、研究目標

綜合上面所概略區分的三階段,筆者擬在本計畫中先焦點放在殖民時期 Langalanga 的領導權研究,並與區域內其他族群比較,待完成後再進行第三階 段一亦即當代領導權轉變的研究。研究進行主要分為三種研究途徑:人類學田 野工作、殖民時期歷史文獻研究、以及區域民族誌的跨文化比較。上年度計畫 已針對殖民時期領導權類型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leaderships)、bigman 權力的運作模式與權力來源、貝珠錢製造者與 bigman 領導權等面向進行研

- 究,本主要的研究主題與預定目標有以下幾項:
- (1)透過就 Langalanga 幾種領導類類型做比較,筆者也擬進一步探討領導者不同性質權力的來源(包括武力戰爭、儀式、知識、聲望、經濟和政治等),當地對權力的觀念,以及概念間的轉換。
- (2) bigman 的特殊性:本計畫主要探討的研究課題是——「作為重要領導類型的 Melanesian bigman,到底是歷史過程,還是社會分類?」筆者希望進一步透過就 Langalanga 幾種領導類類型做比較,bigman 作為領導人物的特殊性,到底應如何定位的問題。
- (3)區域研究的思考:除了權力的理論層面的討論外,本計畫也擬將之放在更大區域範圍內,透過民族誌研讀,與美拉尼西亞其他社會作比較,進一步思考「bigman」類型的適切性、bigman權力基礎與其他領導權相較的特殊性、bigman 與殖民歷史的關連性、以及區域內領導權轉變的原則。這部分第一年筆者於 ASAO 發表的初步論文中已經開始觸及,筆者先將 Langalanga 放在較小的區域內(Malaita 島與周邊族群)比較,在整個 panel 的討論中,筆者認為本研究能對 Melanesia 的 bigman 討論提出不同於主流的新幾內亞民族誌觀點。本研究希望在第二年能花更多時間在區域的比較研究上。

## 參考書目

- Douglas, Bronwen. 1979. Rank, Power, Authority: A Reassessment of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South Pacific Societies.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4: 2-27.
- Feinberg, Richard. 2002. Elements of Leadership in Oceania. *Anthropological Forum*, 12: 9-44.
- Foster, Robert. 1999. Melanesianist Anthropology in the Era of Globlization. *Contemporary Pacific*, 11: 140-159.
- Godelier, Maurice. 1986. The Making of Great Men: Male Domination and Power among the New Guinea Baruya, eds. Maurice Godelier & Marilyn Strather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1. Big Men and Great Men: Personification of Power in Melan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Press.

- Guo, Pei-yi. 2004a. Performing "Manufacture": Notion of Things and Performing "Shell Money Making" among the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展演「製作」: 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的物觀與「貝珠錢製作」 展演). Museology Quarterly (博物館學季刊), 18(2): 7-24. \_. 2004b. From Currency to Agency: Local Currencies vs. Colonial/ State Currencies in the Solomon Islan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PAS and MAP of Univ. de Provence joint conference "Search for Interface: Interdisciplinary and Area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Marseille, France, June 23-25. \_. 2004c. Rethinking Ascribed and Achieved Status: Hierarchy and Equality in Oral Histories among the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Hierarchy and Power",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October 6-8. 2004d. Comparis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Bridewealth Exchange Ritual among the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比較」與人類學知識建構:以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聘禮交換儀式為例).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台灣人類學刊), 2(2): 1-42. Keesing, Roger M. Killers, Big Men, and Priests on Malaita: Reflections on a Melanesian Troika System. *Ethnology*, 24(4): 237-252. Lederman, Rena. 1990. Big Men, Large and Small? Towar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thnology*, 29: 3-16. Lepowsky, Maria. 1990. Big Men, Big Women, and Cultural Autonomy. Ethnology, 29: 35-50. Liep, John. 1991. Great Man, Big Man, Chief: a Triangulation of the Massim. Pp. 28-47 in Big Men and Great Men: Personification of Power in Melanesia,
- \_\_\_\_\_\_. 1996. The Bigmanisation Process: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Secularisation of Power in Melanesia. Pp. 121-141 in *Melanesian Modernities*, ed. J. J. G. C. Friedman. Sweden: Lund University Press.

eds. Maurice Godelier & Marilyn Strathern. Cambridge: Cambridge

- Lindstrom, Lamont. 1981. "Big Man": A Short Terminological Histo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3: 900-905.
- \_\_\_\_\_. 1984. Doctor, Lawyer, Wise Man, Priest: Big-Man and Knowledge in Melanesia. *Man (N.S.)*, 19: 291-309.
- McKeown, Eamonn. 2001. Biros, Books and Big-men: Litera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dership in Simbu, Papua New Guinea. *Oceania*, 72: 105-116.
- Mosko, Mark. 2004. Self-evident Chiefs: Transactions of Chiefly Inheritance and Agency among North Mekeo (PNG). Paper presented at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August 6.
- Sahlins, Marshall D. 1963. Poor Man, Rich Man, Big 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3): 285-303.
- Scaglion, Richard. 1996. Chiefly Models in Papua New Guinea. *Contemporary Pacific*, 8(1): 1-31.
- Schwimmer, Eric. 1991. How Oro Province Societies Fit Godelier's Model. Pp. 142-156 in *Big Men and Great Men: Personification of Power in Melanesia*, eds. Maurice Godelier & Marilyn Strather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江戶時期新造醫學術語之研究」分支計畫簡介

### 張哲嘉

#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1774年《解體新書》的翻譯問世是江戶時期的重大事件,不只成為日本醫學的近代化的契機,同時也使得一般的日本人從此可以直接認識西洋文明,因而帶動了蘭學的興隆,為明治維新後能夠與西方迅速接軌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其影響至今依然歷歷可見。有關《解體新書》以及其後繼者所翻譯創造的新術語與新思想,因而也成為學者所注目的焦點。

如此重要的課題,自然早已有無數學者曾加以探究。不過,到目前為止的研究似乎不曾從這些新醫學術語所具備的「漢字」特性切入,而利用辭彙「群組」的觀念加以分析,似乎仍然有開拓新局的空間,而且可以運用既存不同專業的先行研究方法,收相互截長補短之效。尤其是日製醫學術語對於中、韓文的影響極大,因而這個研究對於近代東亞的新辭彙等議題,也可望帶來新的問題與觀點。

有關蘭方醫學翻譯的先行研究大致上可分成醫生的研究、江戶蘭學的研究、以及語彙學的研究。醫生研究醫學術語乃是專家治學,又在求學階段熟習了醫語的拉丁文或語源,所以在處理個別辭彙的時候有難以取代的長處。但容易太過執著現代醫學知識的標準答案,忽略歷史情境與文化脈絡。相對於醫生,蘭學史家更是研究江戶時期新醫學語彙的主流,他們的研究更具系統,涵蓋的範圍也更廣,以日本地毯式考證的學風,江戶時期的古荷蘭語、社會關係、文化傳播等等課題都有學者加以考究,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而首先利用此一考證基礎嘗試開闢新途徑的乃是語彙學家。大約十年前,歐陸以及留日的中國學者開始展開了一系列有關近代西方知識衝擊東亞後,因為吸收西學而創造的新漢字術語以及新概念的研究。其成果已經分別以各種語言發表,他們並且建立了一個「西學東漸數碼文庫」(http://www.wsc.uni-erlangen.de/etexts/),意圖串連各個領域的學者,長期累積新語彙的資訊與研究成果。當然,醫學術語也是他們有意考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語彙學家所作的研究長處在於對近代西學典籍的書誌學考究十分細密,有 關辭典史料的掌握也令人讚賞,而其所重視的問題在於新語彙發生的時間點以 及傳承關係。然而,他們的長處卻也導向其現有研究的一大缺失:由於對於辭 典的掌握相當自信,因而往往推過度論辭典沒有收錄的辭彙就很有可能是新 創,不免失之武斷;另外,過於專注於前後翻譯的洋書內容之間的比對,如果 之前的洋書已經出現過某語彙,就斷言此乃受到前者影響;如果前書不用該語 彙,則推論此乃新浩。儘管他們就這些翻譯著作的語彙所作的考察工夫,較諸 蘭學史家更為全面,然而他們的研究方法卻顯然有改善的空間。如果考察江戶 時期所流行的漢方與驗屍用語後,就會發現語彙學家所提出的新辭彙,其實有 80%以上可以斷定為當時既存的習用語彙。既然是舊有的語彙,自然不會在新 譯語的辭典中出現,而且,不同的洋書翻譯者在採用這些語彙時,與其說是受 到前人的影響,不如認為是同樣接受既存用語的影響更為合理。同樣的,以這 個研究結果也指出了若干醫生的醫語研究的錯誤之處,如小川鼎三指責杉田玄 白將現在稱為「鎖骨」者翻譯為「缺盆骨」,是「無視於蘭語的原意,而以骨頭 的形狀來加以命名 。其實,玄白只不過是選擇了在沒有必要改變的時候沿用既 有的用語,不求處處按照荷蘭文直譯而已。

從此出發,可以得知既存先行研究的共同盲點,那就是在研究新語彙的同時,忽略了翻譯者當時的舊語境。不管是醫生或是語彙學家,都把全副注意力放在這些新譯作當中詞語可能反映的西洋因素,即使是學術累積最有系統的蘭學史家,似乎也不甚注意江戶時期的醫生在學習蘭學之前,所掌握的語彙究竟如何。畢竟翻譯者要面對的是當時的讀者,那麼在通行的語言中有哪些約定俗成的語彙、當採義譯方式時、如何活用漢字原有的理則來製作新詞,都是討論新辭彙時必須考慮的問題。因而杉田玄白等翻譯者如何掌握漢字來引導一般讀者從漢方醫學的理解來進入西洋身體觀的世界,應有探討的必要。然而,除了「神經」一詞的組合理由曾被不同學者反覆引述外,前述的三類研究似乎均未曾對漢字運用的問題做過系統性的闡述。

本研究計畫的策略即是以語彙學家作主要的對話對象,另外利用醫生的專業術語規範來當作分析的骨架。更具體地說,以往的語彙史分析由於過於注重術語的漢字部份,有時僅僅專意於將書中的辭彙抽出比對,卻忽略了這些漢字術語實際所對應的解剖位置是否符合,也沒有注意到因別名而偶合的問題。如果我們在探討術語演進的時候,使用拉丁文的醫學名詞當作分析座標的軸線,

再將各翻譯醫書中的種種語彙安置在適當的對應位置上,就可以避免這樣的弊病。相對來說,醫生所作的先行研究中,幾乎完全不會犯語彙史家的這類錯誤,但是他們的研究大致均是個別辭彙的演進史,卻很少去注意各個辭彙所選用的漢字之間的橫向關係,因而難免有見樹不見林的缺憾。現代的醫生雖然在醫學知識學有專精,但是缺乏漢方、也就是翻譯者當時習用醫學用語用字的敏感度,因而難以意識到翻譯者決定用同一漢字來翻譯幾個不同的名詞時,是否有特別的理由,又與當時社會既有的漢方醫學觀念有何等關係。換言之,本研究希望在既存的研究成果之上,導入辭彙群組的觀念來探討江戶時期醫學術語的生成過程。

本研究預備僅以影響最大的杉田玄白(1733-1817)、宇田川玄真(1769-1834)、以及大槻玄澤(1757-1827)等三人的翻譯,來探討江戶時期蘭學家理解西洋醫學並將術語固定化的軌跡。計畫先仿效語彙史家的作法,抽出這三位的著作中的醫學辭彙,並依照拉丁文標準加以定位,然後利用重複使用的漢字當作關鍵字,把零散的辭彙加以重組。從此可以看出這三位蘭學巨匠所遵從翻譯原則的系統性,進而比較日本江戶時期蘭方醫學名詞的演化過程。尤其是大槻的《重訂解體新書》(1822)作品乃是遵照乃師杉田的遺訓,將《解體新書》作有系統的改進重譯,大槻是否曾經在某些觀念與杉田有不同的知見,或許可以用漢字為分類基礎的術語群組,偵測出若干可供追查的線索,從而觀照出不只是語彙史家與醫生所不曾察覺,甚至蘭學史家也可能未加注意過的面向,探求江戶時期重要蘭方醫學啟蒙者如何用自幼習染的漢字來理解、把握西方新知的思路軌跡。

有關近代東亞世界受到西學衝擊後,新辭彙與新思想的產生已經成為國際學界關心的重點之一。三年前位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們,結合了日本國內、以及中、韓兩國的專家,組成了「近代東アジアに於ける二字熟語概念の成立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研究班。由於這個工作需要跨國、跨領域的長期協力,因此自今年起更將合作範圍擴大到「西學東漸數碼文庫」的研究團隊,也企圖尋求台灣、美國學者的加入。申請人因為之前出版過有關「法醫」此一漢字術語的形成與影響的論文,因而曾受邀就醫學新術語的問題發表初步的看法,其概略已如前述。就當代的東亞的漢字醫學術語而言,日本的歷史角色尤其重要,特別是在1915年北洋政府的「醫學名詞審查會」審定漢語醫學名詞時,大量拋棄既存的術語而改採日本譯詞;而韓國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所生發的新醫學觀念,畢竟還是透過日本的漢字術語來接受,儘管現在已經少 用漢字,但韓語辭彙仍來自日製漢字術語的發音,所受影響更不待言。因此有 關江戶時期醫學術語的研究,一方面既是本格的日本史研究,同時對於相關領 域東亞新術語與新概念的探討,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是,進行此一研究將 有機會與國際的語彙研究團隊互相提攜激盪,為總合的東亞辭彙一概念史研究 做出貢獻。

## 「和平憲法下的日本外交:鳩山一郎『自主外交』的 戰略思想(1954-1956)」分支計畫簡介

#### 黄自進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 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鳩山一郎是繼吉田茂之後,於 1954 年 12 月 9 日出任內閣總理的民主黨總裁。也是美軍結束佔領日本,日本恢復國際法人地位之後的第 2 任內閣總理。「自主外交」是他的執政口號,主要的意涵包括修改憲法、建立軍備以及與蘇聯中共締結外交關係。修改憲法與建立軍備是一體之兩面。原因是 1946 年 11 月 3 日所發佈的新憲法,是由美國佔領當局一手策劃,不能代表日本民意。特別是憲法第 9 條,明文規定日本不得保持軍備、不得使用武力。這部和平憲法,既然限制了日本的軍備發展,自然也限制了日本發展外交的空間。換言之,當日本的安全,得仰仗美國的保護時,日本的所作所為自然也不可能不受美國牽制。這也是鳩山一郎在倡導「自主外交」時,必須要以修改「和平憲法」為配套措施的緣由所在。

修改憲法,必須要經過兩道程序,首先是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連署通過,其次是全民投票,過半數的投票民眾認同才算完成修憲程序。為了擴大議會席次,鳩山一郎於 1955 年 11 月 15 日,與自由黨談妥合併,決定成立自由民主黨以求擴大陣營。不過,與鳩山一郎對峙的左右兩派的社會黨,為了抵制修憲,也於同年的 10 月 13 日,達成統一的協議。統一後的黨仍稱「社會黨」,而只將左右兩派的頭銜各自取消。這也是社會黨自 1951 年 10 月 24 日左右兩派分裂以後的再度合併。

1956年7月8日參議院的改選,是鳩山內閣修憲工程的第一步試金石,雖然選舉結果,自民黨的議席過半數以外且有小幅成長,可是距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還有一段距離。選舉不利,鳩山內閣的「修改憲法」、「建立軍備」的雄心大計,自然只得放棄。

與「蘇聯中共」建交,是「自主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標的。所謂建交, 就是要建立正常交往管道,互換使節,前提自然是先結束戰爭狀態。由於蘇聯 於 1951 年 9 月退出舊金山和會,使得日本雖然藉由舊金山和會,得與聯合國 48 國會員國簽訂和平條約,可是與蘇聯的關係仍然維持在戰爭狀態。至於中共,由於中共不承認日本政府於 1952 年 4 月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的和平條約,因而日本政府與中共的關係也一直是處於僵持對立。

鳩山總理接任以後,立即宣稱「國民政府與中共均為獨立國家」,表達了他希望與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外交關係之際,仍能與中共有拓展外交關係的期盼。此外,他也曾利用 1955 年 4 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與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進行初步的建交協商,但以後就因美國強大壓力的反對下,不得不擱置了此一建交政策。

在其他三大項選前承諾,皆無法一一兑現之際,與蘇聯建交是鳩山內閣唯一可使力之處。對於日蘇建交,美國並不樂見,可是在強大日本民意的期盼下,美國也不便公然反對。再則,日蘇之間的三大懸案,美國也無能為力。一是聯合國的加盟問題,日本自 1952 年起就開始申請加入聯合國,但每年因蘇聯在安全理事會行使否決權,使得日本年年碰壁不得其門而入。二是極東海域的捕魚權問題。極東海域為蘇聯領海,但卻是日本漁民長年賴以生計的漁場,蘇聯政府長期擱置捕魚權交涉,影響日本漁民生計甚大。三是日本戰俘。雖然鳩山內閣執政時,戰爭已結束 9 年,可是還有 1 萬 2 千 多 名 的 日 本 戰俘被蘇聯政府拘留,這些戰俘的遣返,自然得待日蘇兩國直接交涉。

日蘇建交談判,始自 1955 年 1 月 25 日,結束於 1956 年 10 月 19 日。換言之,此一談判歷時 1 年 8 個月之久,可見談判之艱鉅。雙方爭執的最大焦點是領土問題。其中以北方四島,也就是齒舞、色丹、國後、擇捉的歸屬問題爭執最烈。齒舞、色丹兩島位居北海道,國後、擇捉兩島卻位於千島群島的南端,這些原本屬於日本的領土,卻在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對日宣戰後,為蘇聯軍所進佔。

在交涉過程中,蘇聯表示願意歸還齒舞、色丹兩島,但拒絕歸還國後、擇捉兩島。由於美國在日蘇交涉過程中,不但支持日本政府對北方四島的領土要求,甚至認為日本也不應放棄對千島群島及南庫頁島的主權要求。千島群島及南庫頁島在美蘇英三國於1945年2月所簽訂的雅爾達密約中,原本已內定為蘇聯領土。再則,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中,日本也正式宣告放棄對千島群島及南庫頁島的主權。是今,美國一改常態,反而然愿日本要討回這兩島主權。美國態度的驟變,不僅對鳩山內閣形成一股不可對領土主權讓步的強大壓力以外,

同時也鼓舞了日本國內的反共勢力,對鳩山一郎的日蘇談判,更是處處牽制。

為了擱置領土主權,最後日蘇雙方決定不簽訂和平條約,只以發表共同宣言的方式,結束兩國戰爭狀態,恢復外交關係。至於和平條約,則決定待雙方恢復外交關係後,再繼續協商。對於領土問題,則在共同宣言的第9條中,有如此約定。「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為滿足日本國的期盼,以及考量日本國的利益,同意將齒舞群島及色丹島交還日本國。不過,這些島嶼的歸還,則以日本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簽訂和平條約後才得付諸實現」。換言之,日本政府因不能順利索回北方四島,寧願不簽和平條約,希望將來還有再議的空間。而蘇聯政府則以不簽和平條約,連齒舞及色丹兩島都拒絕歸還。

日蘇之間因北方四島的領土爭議,至今尚無法解決,兩國的和平條約也因而拖遲到今日還未簽訂。這期間,更因中共與蘇聯交惡,日蘇關係更加複雜。也就是說,中共為求拉攏日本對抗蘇聯,於1972年與日本建交後,隨即在1978年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在這和平條約中,有一影射蘇聯的「反霸權條款」,使得日中兩國的接近,也被蘇聯視為是一種圍堵的敵意行為。這些因素的發展,更使得蘇聯不肯輕易放棄具有軍事戰略位置的國後、擇捉兩島。

是以,研究鳩山內閣的「自主外交」,不僅可理解戰後初期,日本在恢復國際法人地位以後,對獨立自主外交的殷切期盼,也可理解美國視日本為遠東地區反共勢力的橋頭堡,不願日本與共產勢力有過度親密往來的敵我意識。自民黨主張修憲,社會黨反對修憲,自民黨在外交上採親美政策,社會黨則信奉馬克斯主義,外交上明顯親蘇,這些內政與外交的主張,無法用單一標準去歸納時,鳩山內閣時的修憲爭議、日蘇建交研究,無疑的也可為理解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提供一個最好的切入角度。職是之故,本計畫以時代背景為經,以鳩山一郎的戰略思想為緯,相互參照,應可為理解戰後日本外交的核心理念、日本的國內生態、日蘇關係、日美關係以及日本與中共的關係,提供最深厚的基礎。

當爭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已成為今日日本外交首要課題之時,修改「和平憲法」,讓日本有充分軍事力量扮演政治大國角色、讓日本可參與聯合國的維持和平部隊(Peacekeeping Force)等議題,已成為當前日本政壇的最熱門話題。因此,就此刻而言,修改「和平憲法」乃是此後日本政治的必然走勢,若能回顧「和平憲法」在日本發展的過程,不僅有助於理解當前日本的憲政辯論,也能對修憲議題蘊含的戰後 50 年來日本政治及社會變遷的時代容貌,提供寬廣的背景知識。

## 「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的變革」分支計畫簡介

### 陳恭平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員 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立法院已於最近通過改變立法委員的選舉辦法。以提案內容來看,新舊選舉辦法的差別相當大。主要有下列 5 項:(1)每一選區的席次,由以往的 1 到 1 3 人不等,改為僅有一席。換言之,每一選區內日後所選出的立委,必然為該選區內的最高票獲得者。(2)由於上述的改變,選區規模必須縮小。這表示選區必須重劃,將原來的全國 2 9 個選區改為 7 3 個選區。(3) 選區重劃之後的總席次,約為舊制度的一半。(4)每個選民可以有兩票,其中一票投給自己選區內的候選人,另外一票投給政黨。(5)政黨的當選人,一方面來自選區的勝利者,另一方面來自所獲總票數的比例分配。這個選舉辦法在實施之後,將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將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事實上,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要的民主國家裡除了義大利、紐西蘭和日本(Gallagher 1998)之外,幾乎沒有國家在選舉制度上做過這麼重大的改變。在這些國家裡,最值得我們去深入瞭解的,是日本的政治變化。主要的原因,在於1994年之前日本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方式,正是今天台灣立法委員選舉所採用的單記不可轉讓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ing system,SNTV)。在1994年之後,日本改採「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而這正是台灣日前所通過採用的選舉制度。換句話說,台灣在改變前後所採用的選舉制度和日本改變前後所用的制度,是幾乎完全相同的。不但如此,日本在新制度之下,已運行有10年之久。日本這十年的經驗,對台灣的參考價值之大不可言喻。

SNTV 制的原始用意,是希望一方面可以利用選區內候選人的競爭選出適任者,另一方面又可以用這些候選人的總得票數來反映政黨支持率,並依此分配不分區席次。因此它一方面希望在選區選賢與能,另一方面又保留比例代表制的好處。但台灣近二十年的使用經驗,並非如此。它所產生的第一個缺失是某些代表少數意見或利益的候選人,只要他們握有某些鐵票,就可以持續當選。此外,SNTV 的另一個缺失,是它所衍生出的政策及選民的策略性行為。Browne

and Patterson(1999),Cox(1996),Cox and Niou(1994)及 Horiuchi and Kohno(2004)即說明在 SNTV 下,政黨的策略性提名及選民的策略性投票行為對選舉結果的影響。一般的看法,是如果一個政黨的榮枯取決於政黨提名的人數是否適當及選民配票是否精確,則並不是一個好的選舉制度。

但日本之所以產生選舉改革,其背景和台灣並不完全相同。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降低自民黨派系對候選人提名和閣員人選決定的影響力,從而減少金錢及酬庸政治的發生(見 Christensen 1994; Horiuchi and Kohno 2004; Huang 1996; Shiratori 1995)。因此,稍後的研究也以其對派系和政策的影響為主(見第二部分的文獻討論)。

這個計畫的目的,是希望以台灣改革的需要為著眼點,來研究日本改革後的結果。一方面,我想瞭解新制度選出的代表,是否較能代表大多數選民的利益,而非只是少數選民的利益。表面上看,這似乎是理所當然,因為每一選區只有一個席次。但其實並非如此。由於另一半的當選人,其實來自政黨的不分區提名,所以這一部份的當選人,可能只是酬庸下的結果,不見得真正代表中道選民的意見。另一方面,我想瞭解這個制度是否有造成兩黨政治的壓力。由於 Duverger 定律的運作,單席次選區很容易造成選民放棄較不可能當選的所造成兩黨對決的態勢。這個定律雖在很多實証文獻上得到證明(見 Taagapera and Shugart 1989),但並立式兩票制並非純粹的單一選區制。由於一半的當選人來自政黨所獲得總票數的比例分配,因此仍有很強的比例代表制精神在其中。這兩種精神完全相反的制度(單一席次及比例代表)在互相混合後的結果如何,其實不單只是對日本政治的瞭解,本身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論性課題。

如前所述,日本的選舉改革,其主要的著眼點,和台灣不盡相同。日本的改革重點,是希望削弱自民黨派系的力量,從而減少金錢及酬庸政治。台灣的改革,至少從表面上來看,一方面是希望排阻只訴求少數特定選民的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另一方面希望政黨的當選人數能真正代表政黨的真正支持度(而不是靠提名人數的精確及選民的配票能力)。因此這個計畫的取向和文前所討論有關日本經驗的文獻的取向,也有所不同。首先,我希望瞭解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否會如期望的選出較中道的候選人來。一個國會議員的政治立場是否「中道」,或是否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很難用一個指標來衡量,而且必須由他在國會中的記名投票紀錄(roll call)來瞭解。在這方面,Levitt(1996)所定義

的指標,可以用來參考。媒體的評論,也是另外一個可以參考的指標。

其次,我們想瞭解是否新的制度會使政治生態朝向兩黨政治發展。這在單席次選區裡,是理所當然的結果,而且有很多實驗結果支持(例如,見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但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並不是純粹的單一席次,因為選民的另一票將投給政黨而由政黨按比例分配席次,所以仍有非常強的比例制精神。在這方面,日本實施的結果如何,非常值得參考。另外,我也計畫利用一個理論模型,來研究當單一席次和比例代表兩種制度混合使用時,所產生的選舉結果會是什麼。由於各黨所得席次的消長,是非常容易取得的資料,因此利用所得分配指標 Gini 係數來計算,非常容易得到確定的結論。

總括來說,這個計畫希望能有兩個學術上的貢獻:

- (1) 瞭解政治制度的改變,對政治生態的影響。當然,在理論上要研究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並不那麼困難。但由於在現實上,我們很少看到民主國家曾經對選舉制度做這麼大幅度的改變,因此實証研究,並不那麼容易。而日本在十年來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在實証上非常好的研究機會。
- (2)由於台灣選舉制的變革,也正朝向日本現有的制度發展,因此對日本 議會政治的瞭解,也提供檢討台灣政治發展的絕佳參考。

## 參考書目

- Browne, Eric C. and Dennis Patterson. 1999. An Empirical Theory of Rational Nominating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259-289.
- Callagher, Michael. 1998.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in Taiwan and New Zealand, 1996. *Party Politics*, 4: 203-228.
- Christensen, Raymond V. 1994. "Electoral Reform in Japan: How It Was Enacted and Changes it May Bring". *Asian Survey*, 34: 589–605.
- Cox, Gary W. 1996. Is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uperproportional?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740-755.
- Cox, Gary W. and Emerson Niou. 1994.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 221-236.

- Horiuchi, Yusaku and Masaru Kohno. 2004. SNTV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Mechanical Effect, Strategic Candidate Nomin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Japan's One-Party Dominanc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2004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SA, September 2-5.
- Huang, David. 1996. Electoral Reform is No Panacea: An Assessment of Japan's Electoral System after the 1994 Reform. *Issues and Studies*, 32: 109-139.
- Levitt, Steven D. 1996. How do Senators Vote? Disentangling the Role of Voter Preference, Party Affiliation, and Senator Ideolog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425-441.
- Shiratori, Rei. 1995.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Jap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 79-94.
-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 Shugart.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日本新設計力的社會基礎」分支計畫簡介

#### 鄭陸霖

###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本研究計畫設定對象是日本的設計產業,尤其是台灣的製造實力與品牌推廣最需結合的工業設計。此為本人針對日本社會的首次區域研究,同時社會學關於工業設計的研究幾乎為零,因此本研究具有探索性研究的特色,目標在:(1)培養進行區域研究的基礎能力,包括建立當地產業人脈、累積在日本從事田野研究的經驗、磨練日語聽說讀寫能力,與對日本社會政經脈絡的理解;(2)透過對日本工業設計產業的近距離研究,開啟對「後泡沫經濟」新日本社會的理解;(3)本人未來幾年的社會學研究將以「設計」為焦點,以日本設計產業先進而完整的生態為對象,有助於摸索與構築「設計」的社會學理論思考、分析架構或命題。

日本經歷 1990 年代的長期不況,整體社會經濟環境開始鬆動與重組,為日本社會的勞動市場、學校教育、產業結構等都造成強烈衝擊,然而日本也漸漸找到新的活力,發展「設計力」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也是日本新經濟實力的象徵。設計力既然不同於傳統的工程研發或製造效率,牽涉到不同以往的人才養成、企業管理、產業協調與政策工具。日本社會是如何發現與界定這個目標?政府提出怎樣的政策工具?民間組織如何推動設計的普及化?人力資源如何培養與運用?設計產業的結構如何?設計產業與製造產業間如何分工、如何連結?總之,日本新設計力的社會基礎為何?這是本研究想要探究的課題。

具體而言,我預期此探索性研究的執行成果有:

- 一、建立日本設計產業的歷史、結構、網絡、事件、機構等的基本資料庫。 以供未來深入研究的依據。
- 二、充實本人目前還很粗糙的理論直覺,提出更具體的理論修正與理論命題。之前已提及,產業或發展社會學是很容易跟經濟學、管理學相重疊的領域; 軟競爭力為主的工業設計相對而言,其實是更適合社會學的比較利益。就西方社會學理論傳統而言,也可以切入到文化研究與傳統產業研究之間懸滯的空白

#### 182 亞太研究論壇第三十一期 2006.03

地帶。正因為以上的背景存在,本研究計畫的經驗與理論發現的相對價值都會 比較容易突出。

三、建立長期日本區域研究的人脈與田野研究經驗。此為本人初次進入區域研究的計畫,主要在探索性質,希望先從廣泛的產業層次來討論,訪談對象並非分析對象,而是當成資料提供者。將可以建立一個比較綿密的在日網絡,也有助於以後發展更深入的日本研究。

四、為「新日本研究」提出從產業與發展社會學出發的新提案,台灣應該可以藉地緣與語言方便,先期切入這個可見的將來極可能重新復甦的研究領域。

# 「『不完全政經一體』VS. 『不完全政經分離』: 1972 年 斷交後日華關係新架構的形成與展開」分支計畫簡介

#### 張啟雄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 一、計畫的研究目標與重點

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如何從一個喪失主權地位並接受盟軍佔領的戰敗國,到1952年「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1951)簽定,重新恢復主權地位後,被迫選擇與中華民國建交,但同時亦不放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實質關係等盟軍佔領下的日本外交研究,在日本可謂汗牛充棟。因此,本計畫乃將研究重點置於1952年日本恢復主權獨立後的日華關係。

從 1952-1972 年,在美國軍事保護下的日本,一方面礙於冷戰,受美、蘇兩大陣營兩極尖銳對峙格局的制約,另方面又面臨兩岸分裂分治,但卻同時主張「只有一個中國」(only one China),並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建交難題時,如何同時與中華民國(ROC)建交,但又不放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經營實質關係;相反的,1972 年以後,如何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也不放棄與中華民國經營實質關係的這二段史實,一直都是研究戰後日中和日華關係中最重要的研究課題。這種「政經分離」的政策,就成為日本政府在兩岸謀取政經利益的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日本政府的「政經分離」原則,就成為研究者處理日本對中、對華關係中有用的切入點。這個切入點,正是建構本計畫理論架構的基礎。

為了建立戰後日本對兩岸的外交型模,並據以分析戰後日本對兩岸政策的形成與轉變,本計畫,在方法論上,擬承繼前期計畫——「政經分離 vs.政經一體: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2-1972)」的成果,並進一步深化其分析層次,將歸納出的分析架構(analytic framework)發展成為「不完全政經分離 vs.不完全政經一體」的理論架構,用以分析 1972 年日華斷交後雙方關係新架構的形成、展開過程與游移擺盪的幅度。

為了在研究主軸的類型分布、政經研究範疇的整合與理論如何結合史料的方法論運用等方面有所突破,本計畫選擇戰後「日華」關係,而非「日中」關係,作為研究重心。又,透過日華政經互動的整合研究,來克服只從政治外交或經濟貿易面向的單學科研究,而未能解釋清楚的問題。它的優點在於可避免過去常因戰後中、日、華三方不同時具備「正式」政經關係,致使日華或日中政治關係中的經貿目的與經貿關係中的政治互動,難以清楚呈現的研究限制。此外,期待能在方法論上,進一步探索日本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決策者、國內與國際等三層次對決策的影響,釐清在中、日、華政經關係的類型形成及轉變中,因時期不同,對影響比重所帶來的衝擊與變化。

最後,在強化理論與史料的結合運用上,本計畫除延續蒐集日、台兩地所 藏官方檔案的調閱、影印、整理與分析外,同時也進行雙方的官方出版品、公 開文書、回憶錄及歷年報章雜誌的資料蒐集,進而期待對雙方相關官員、政要 及學者進行訪問,來彌補部分官方檔案尚未開放之史料不足的遺憾,以為海內 外日華關係研究,帶來理論建構的學術貢獻。

## 二、計畫的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計畫擬透過 1972 年日華斷交前後至 1991 年冷戰結束的二十年間,日華在政治——經濟關係上的互動,來考察、描述與解釋,雙方新政經關係架構的形成、展開與演變歷程。在理論架構的運用上,本研究主要係以拙著(2004)「政經分離 vs.政經一體的『名實論』分析: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2-1972)」一文的成果作為研究基礎,進一步對戰後日華政經關係類型的轉換進行分析,進而提出理論架構的修正。首先,根據兩國政經關係之「有一無」的二分類變項(dichotomous variables),建構「政經一體」、「政經失衡」、「政經分離」與「政經斷絕」等四個國家對外政經關係的理想型(ideal types)。其次,透過史料驗證中、日、華三方因不同政經互動類型所呈現的「名實」狀態,然後進一步加以轉換,並抽繹出 1972 年以前,日本在兩岸關係上,採取對華「不完全政經一體」、對中「不完全政經分離」等二個次類型(sub-types),最後再藉此主、次類型的型模建構(model-building),來掌握戰後日華政經關係形成與演變的主要趨勢,以及過程中雙方關係「游移擺盪」的微妙變化。

根據初步分析後,可以發現 1952-1972 年的日華關係,基本上是由「政經一體」的次類型——「不完全政經一體」走向「政經分離」的次類型——「不

完全政經分離」的類型變遷。隨著 1972 年的日華斷交與日中建交,日本的對華關係,也因日中、日華「政治名分」地位的改變,正式進入「不完全政經分離」的逆轉式次類型關係,以迄今日。1972 年以前,日華保持「不完全政經一體」關係的客觀事實,正好可以反映雙方政府過去在政策決定上所抱持的相對立場。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維持「政經一體」的日華關係,和要求「政經斷絕」的對中政策,乃是中華民國政府自大陸撤退來台後,對日本政府所採取的一貫態度。惟對日本政府而言,無論就長遠的政治或經濟利益來看,完全接受當時海峽兩岸「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思維,對戰後初期亟思實現經濟復興之最高國家目標的日本來說,的確有其扞格難容之處。

由此可見,在冷戰初期,美、蘇兩極對峙的國際格局與海峽兩岸分裂分治,但卻又同時主張「只有一個中國」的外交難局下,日本政府因礙於國際層次因素的制約,必須追隨美國進行全面「圍堵」(containment)以中蘇共為首之共產主義陣營的全球戰略布局,因而與中華民國繼續站在「政經一體」的主類型框架下,維繫彼此的政經關係。不過,因受到來自國內層次與決策者個人對政策認知因素的影響,迫使日本政府必須與中共同時保持「政經分離」的交往,因此日華之間的「政經一體」關係,在這三個層次因素的交互影響下,於是便進入了「不完全政經一體」的次類型互動關係。從理性決策的觀點來看,由於國家或政府可視為是在手段(means)上最能選擇極大化國家利益的行動者(actor),因此在1972年以前,日本政府對兩岸分別採取「對華『不完全政經一體』、對中『政經分離』」的作法,乃是日本一方面為因應國際環境的限制,另方面要追求國家的最大利益之下,兩相折衷的政策產物。

惟自 1971 年起,先因聯合國代表權遭中共取代、復因美中關係由對抗縣趨緊密,致使日華關係頓失維繫「政經一體」框架的二大支柱。此時,日本國內層次因素與內閣的決策動向等非國際層次的因素,自然就成為決定日華關係新架構的關鍵。1972 年 2 月,尼克森(Richard Nixon,1969-1974)總統訪中,日本國內包括在野黨、輿論界及企業界,因受「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的衝擊,紛紛倡議日中及早建交。1972 年 6 月 17 日,向來在政治上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佐藤榮作內閣(1964-1972),因違反時代潮流,背負莫大壓力,乃不得不黯然隱退。新任自民黨總裁田中角榮,在就任首相之前,先與黨內重要派閥領袖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與三木武夫,達成日中早日建交的共識。因此,田中角榮主政後,日本政府的國家目標,便是儘速推動日中關係正常化的政策。

於是,中共提出日中關係正常化的「復交三原則」。不過,日本並未照單全收,尤其是在「承認」(recognize)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日本始終僅以「理解並尊重」(understand and respect)的模糊用語,加以回應。1972年,日華斷交,從此雙方關係,由官方轉為民間,其實務關係改由日本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與中華民國的「亞東關係協會」承辦。兩會的交往機制,在形式上雖然屬於民間團體,但在實質上卻具備濃厚的官方色彩。此時,日台兩地的經貿往來,不但沒有因為斷交而中斷,其貿易總額反倒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儘管在1980-1986年間,日中貿易總額開始持續超越日華貿易總額,尤其是在1993年以後,更呈現出大幅領先的態勢。

不過,若從日本對兩岸進出口依存度的統計資料來分析,則可明顯看出,在日、中、華三方經貿交流的供需結構中,日本雖在進口方面依賴中國大陸較依賴台灣為深,但卻以紡織品、石油與原料等技術層次較低的製品為大宗;至於在出口方面,截至冷戰結束前,日本對台出口貿易依存度,除了在1975年與1984-1986年,曾數度低於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依存度外,其他時期均較时大陸的出口貿易依存度外,其他時期均較时大陸出口貿易依存度為高,而且是以附加價值較高的機械類和加工製成產品為大宗。相對而言,日本在進口上雖需仰賴大陸的廉價原料,但其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出口則仰賴台灣市場較多,因此在日、中、華「三角經貿結構」中,台灣就成為日本外貿的重要出口市場,此即日本持續以「政經分離」的原則作為處理兩岸關係的主要理由。於是,在日中關係由「不完全政經分離」,原則作為處理兩岸關係的主要理由。於是,在日中關係由「不完全政經分離」,與作為處理兩岸關係的主要理由。於是,在日中關係由「不完全政經分離」,與不完全政經分離」的類型。在日中關係正常化後,日本對兩岸政經交往類型的逆轉,一方面保障日本在大陸獲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另方面也能持續擴大它在台灣的經濟利益,此即最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政策選項。

因此,即使日華之間先後由於田中內閣(1972-1974)及三木武夫內閣(1974-1976)時期的「台日航權」爭議與鈴木善幸內閣(1980-1982)時期,中華民國經濟部對日華貿易巨額逆差,採取禁止部分日貨輸入的斷然措施,因而在實務關係上發生齟齬外,大體而言,日華關係始終維持在「不完全政經分離」的框架內進行。中共雖堅持「一個中國」與「漢賊不兩立」的原則,惟也無法完全排除日華雙方在實務關係上透過「非正式」(informal)管道進行政治接觸的可能。1980年代,日中關係隨著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與「光華豪事件」的爭端而逐漸動搖。1990年代以後,日本在泡沫經濟的

衝擊下,更因中共的綜合國力不斷提昇而備感威脅。雙方國力,一升一降,矛盾日生,齟齬日劇。

1995年,台海爆發第一次飛彈危機,日本輿論對中共的舉動產生一面倒的批判。根據 1996年日本國內的輿論調查顯示,當年受訪的民眾,對中共抱持「不親近感」與抱持「親近感」的百分比為 51.3:45,可知日本民眾對當時日中關係的評價,負面多於正面。這種現象,是自 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定以來,日本國內輿論對中共的評價,首次出現負面多於正面的逆轉現象。此時,在日華「不完全政經分離」關係中的「政治名分」親疏度,在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時期(1988-2000)「務實外交」政策的推波助瀾下,更出現緊密度提昇的現象。這點可由 1991年5月,日本政府發表「對台實務交流擴大方針」,並於隔年5月允許中華民國將原駐日機構—「亞東關係協會」,更名為官方色彩更加濃厚的「駐日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舉動,得到印證。

不過,儘管冷戰結束後,在日華「不完全政經分離」關係中,其「政治名分」的緊密程度,因國際環境的變化和日本國內與情對中共態度幡然改變等因素的影響,出現比過去更加接近「名分判準線」(即兩國有無正式邦交關係的類型分界線)的非尋常現象,但只要中共仍舊依循國際法則處理其國際關係,並在國際社會中有效貫徹其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與「漢賊不兩立」政策,在可見的未來,日華關係其實很難因之跨越「名分判準線」,進而逆轉成為「政經一體」的運作框架。

總結二次戰後日華或日中政經關係類型變化的歷史經驗可知,政治因素仍舊是其中最關鍵的決定力量。正因如此,無論現階段日華經貿關係進展到何種熱絡的境界,經貿作為雙方「低階政治」(Low Politics)關係的一個起點,終究有其難以突破的侷限。根據本計畫從過去日華與日中關係的形成及演變過程的研究來看,幾可確定:「政治外交結構上的問題,最後往往只有依尋政治邏輯才有可能突破」。凡企圖以「經濟」手段(means),來達成「政治」目的(ends),或單憑經濟關係的緊密化,終究無法跨越「名分判準線」,突破政治藩籬的目標。由此可知,經濟只能扮演「影響」因素,因為政治藩籬必須透過政治邏輯才能解決。相對的,當政治條件驟變時,反而會對國家間經貿往來的盛衰,帶來深遠的影響。

又,在「政經分離」的基本架構下,日本在對兩岸進行政經運作的過程上, 次類型的「不完全政經分離」才是日本和兩岸交往的政策手段。相對的,「不完 全政經一體」則是兩岸爭取對日外交所得到的不完整政經利益。1972年,兩岸情勢逆轉後,日本對兩岸政經交往類型的基本架構與兩岸對日的外交格局,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只是適用對象對調而已。所以說,二次戰後,「政經分離」的概念,已成為日本對兩岸政權政經交往過程中所使用的基本模式。「不完全政經分離」則是使用的政策手段,「游移擺盪」則是政策手段所造成的起伏現象,而此三者正是日本對兩岸唯一不變的一貫政策。因此,在前一階段的日本對兩岸政經關係研究中,先歸納建構出一套研究的基本模式,再用以檢驗下一階段日本對兩岸政經關係的歷史發展,這種宏觀架構的建立也是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之一。

### 三、計畫的預期成果與學術貢獻

#### (一) 本計畫的預期成果

本計畫將於 2006 年 12 月 31 日如期執行完畢,在研究成果上,預計可完成 學術論文一篇。另,在研究助理的培訓上,本計畫除要求助理先接受嚴格的理 論訓練外,並要求其參與相關學術討論會、協助史料蒐集與口述訪談的紀錄和 整理工作。此外,因應研究需要也必須參加本院相關研究技術訓練的課程,預 料將對助理未來進行深造、獨立研究或日後參與共同研究時,帶來莫大的助益。

# (二)本計畫的學術貢獻

本計畫在完成後,估計可以帶來以下幾項具體的學術貢獻:

第一、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可向前推進一步。基於研究目的,可在研究主軸的類型及其數量分布方面,彌補過去許多國內外相關研究,常只將日華關係當成是影響日中關係的一個因素而已,以致未能採取以日華關係作為研究主軸的缺失。

第二、在研究範疇的整合、理論與史料的結合運用方面,將詳盡剖析戰後 日本對兩岸所採取的政經交往原則,並為日本對華政經關係的形成與演變,建 構完整的理論分析架構,以縮減過去相關研究在理論與史料鋪陳上的知識鴻 溝。除此之外,蒐集、整理最新檔案史料、訪談紀錄等也是強化第一手資料不 足的有用辦法,因此為學界與實務界提供更加詳實的參考資料也算是一項小小 的貢獻。

第三、在方法論的強化方面,將於整合影響外交政策形成之微觀與宏觀層

次因素的主流發展基礎上,進一步釐清戰後不同時期,日本對華政經交往政策 的形成,在決策者、國內與國際三層次因素上之影響比重的微妙變化。

# 「憲政體制與國際人權:亞太國家人權委員會 之比較分析」分支計畫簡介

#### 廖福特

本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 一、研究目標與重點

國家人權機構的問題首先是 1946 年在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經社理事會)中討論的,比大會宣布「世界人權宣言」還早了兩年。1946 年經社理事會第二屆會議請各會員國,「考慮宜否於各該國內設立資料組及地方性之人權委會並與之合作以便推進人權委員會之工作」。在 1960年時有一項決議又重提此事,該決議確認國家機構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可發揮重要作用,該決議請各國政府鼓勵這類機構的組成和延續,並將一切有關資料提交祕書長。這一進程目前還在繼續,祕書長定期將收到的資料匯交人權委員會、聯合國大會和各國。

由於人權領域制定標準的工作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迅速發展,關於國家機構的探討越來越集中於一點,這些機構可通過哪些途徑來協助國際標準的切實執行。人權委員會在 1978 年決定組織一次研討會,以便除其他外,擬訂國家機構的結構與職能準則。因此 1978 年 9 月在日內瓦舉行了關於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和地方機構的研討會,會上通過了一組準則。

這些準則隨後得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及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的核可。聯合國大會請各國採取適當的步驟,在尚未建立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的國家建立這樣的機構,並請祕書長就現有國家機構提交一份詳盡的報告。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 1990 年要求舉行一次研討會,由從事促進和保護人權 工作的國家機構與區域機構參加。研討會的宗旨是審議國家機構與聯合國及其 專門機構等國際組織的合作模式,並探討提高國家機構效能的途徑。據此關於 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的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於 1991 年 10 月 7 至 9 日在巴黎舉行。會議的結論為建立「關於國家促進及保護人權機構的地位及職權之原則」(Principles relating to the status and functioning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即通稱之「巴黎原則」(Paris Principles)。「巴黎原則」後來得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1992/54 號決議核可,其後又經聯合國大會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34 號決議核可。「巴黎原則」之內容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即 (1) 權限與職責;(2) 組成和獨立性與多元化的保障;(3) 業務方法(4)具有準司法權的人權機構的地位。「巴黎原則」成為各國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準則,亦是評估各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符合國際標準之評估準繩。

而在亞太區域部分,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Asia Pacific Forum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應是與台灣最可能有直接關係的,1996年時澳洲、紐西蘭、印度、印尼等國家決定設立一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如同其「拉剌其亞宣言」(Larrakia Declaration)所示,此論壇之宗旨是(1)協助此區域之國家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2)拓展各國家人權委員會彼此間之支持、合作及共同活動;(3)歡迎本區域中符合巴黎原則之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加入成為會員;(4)鼓勵各國政府及非政府人權組織以觀察員之名義參加本論壇之會議。而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之會員數目已由剛成立之六個成長為現今之十二個,其中包括澳洲、紐西蘭、印度、印尼、斐濟、馬來西亞、蒙古、尼伯爾、菲律賓、南韓、斯里蘭卡及泰國。

本研究計畫之目標是針對兩個亞太國家人權機構之成員:馬來西亞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作深入完整之分析,因為這兩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說是此區域中最有根基的人權委員會。

本研究計畫應是國內相關領域之先驅者,對於領導國內學術界在國家人權委員會應有相當助益。同時在實用層面,這些研究成果可提供國內對這兩個國家人權委員會之進一步瞭解,未來如果台灣設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亦可進一步與這些國家人權委員會交流及合作。

# 二、已有相關研究之回顧與評估

國內學術界對國家人權委員會此議題之探討並不多,傅崑成教授著有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Trends and Response〉(傅崑成 1991),韓國棟先生則完成〈各國政府設立人權事務專責機構之趨勢與我國政府應有策略之研究〉(韓國棟 1993)。此二文論述各國政府設立人權事務專責機構之情形,兩位之著作可說是重要的中文參考文獻,但是此二著作可能有 2 點必需補足,一者是兩篇論文並未嚴格區別獨立之人權委員會及國會與行政部門底下所設立之人權機制,然而一個國家之獨立人權機制與國會及行政部門之人權制度是有所不同的。另一待補足的是,此 2 篇論文分別於 1991 年及 1993 年完成,而國際上國家人權委員會近年來有長足之發展,有許多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在 10 年內設立的,因此如果要對國家人權委員會作一完整之研究必需補足最新之資訊。另外國內學術界尚未開始對亞太區域之國家人權委員會作深入之研究。

筆者則曾撰寫三篇相關之文章:〈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及愛爾蘭國家人權委員會〉〈廖福特 2000〉〈Establishing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n Taiwan: Role of NGOs and Challenges Ahead〉(Liao 2001)及〈聯合國對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推動與實踐〉(廖福特 2003),而這些作品而作為分析馬來西亞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基礎及比較基準。

# 三、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方法論(methodology)係採功能論,功能論(functionalism)係對於國際制度、行為主體及其規範之一種認知及研究理論,此理論是從使特定制度能在所需之合作領域中,能有各種不同之效率或公義運作之角度出發,其所採取之諸多方法包含從相對狹隘之法律方式解釋國際組織之章程,到較廣泛之說明制度如何運作及如何可能發展之理論。

為達成本計畫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採之方法主要有四種:

- (1)歷史分析法:係對特定制度或現象之發展及沿革為分析,包括在不同時期之轉變或調整變化,但本研究方法並非僅是單純之演進過程之臚列,而應將研究對象發展過程中轉變或修正之理論、理念或因素予以探求並說明,以供既存及未來發展制度之借鏡或參考。
- (2)實證規範分析法:本研究方法是法學研究文章最常採取而且是必要採取之研究方法。透過對實證規範之分析,能瞭解特定法律規定或習慣之性質、

所涉及當事主體之權利義務關係、該規範所產生之作用及效力如何。

- (3)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係從具體社會生活事實之內涵,探討適用系爭法律規範時所產生之效果,以及檢視對該個案之爭議問題有無具體有效之解決,抑或形成如何之爭議(即 hard case 之狀況),而更重要者係分析該案例對於相關法律之未來發展有何影響。
- (4)社會功能檢驗法:社會功能檢驗法係從總體之觀點,就特定法律規範 之適用在特定環境或領域中,對相關主體在生活行為以及整體社會活動上,所 產生之影響如何之分析,此整體之功能分析結果可作為系爭適用規範,修正或 調整之實證參考依據。

同時本研究計畫將採取以下之分析架構:

青、聯合國之理想

貳、國家之架構

- 一、政府架構
- 二、憲法人權條款
- 三、參加國際人權條約之情形

參、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法律規範方式

- 一、憲法、法律或命令?
- 二、是否符合巴黎原則?

肆、國家人權委員會之組織

- 一、政府架構是否調整?
- 二、獨立委員會?或隸屬哪個機關?
- 三、細部組織

四、是否符合巴黎原則?

伍、國家人權委員會之職權

- 一、職權為何
- 二、施行情况
- 三、是否實踐巴黎原則?

陸、結論

#### 四、預期成果及學術貢獻

本研究計畫將針對兩個亞太國家人權機構之成員:馬來西亞國家人權委員 會及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作深入完整之分析,因為這兩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 說是此區域中最有根基的人權委員會。

本研究計畫應是國內相關領域之先驅者,對於領導國內學術界在國家人權 委員會應有相當助益。而對於整個東亞區域研究而言亦可開創一新的研究視窗。

同時在實用層面,這些研究成果可提供國內對這兩個國家人權委員會之進 一步瞭解,未來如果台灣設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亦可進一步與這些國家人權委 員會交流及合作。

# 參考文獻

- 傳崑成。1991。〈National Institut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Trends and Response〉。《社會科學論叢》,39:103-119。 廖福特。2000。〈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及愛爾蘭國家人權委員會〉。《新世紀智 庫論壇》,9:74-78。
- \_\_\_\_。2003。<聯合國對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推動與實踐>。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國史館及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舉辦,「人權的歷史與理論學術研討會」,12月6-7日。
- 韓國棟。1993。〈各國政府設立人權事務專責機構之趨勢與我國政府應有策略之 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 Liao, Fort Fu-Te. 2001.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n Taiwan: Role of NGOs and Challenges Ahead. *Asia-Pacific Journ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2(2): 90-109.

# 「亞太地區企業間網絡統理的比較研究:台灣、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泰國的比較」分支計畫簡介

#### 李宗榮

#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今年我在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從事的研究計畫名稱為「亞太地區企業間網絡統理的比較研究:台灣、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泰國的比較」。這個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在針對泛亞太地區各市場的企業間的網絡統理(intercorporate networks governance),從事全面而完整的比較分析,俾對亞洲地區經濟的企業統理機制與整體企業發展影響有全面而比較性的瞭解。本研究預計選定台灣,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與新加坡共五個國家,針對企業網絡資料,以董監事連結(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為主,其他企業網絡資料為輔,以每個國家約300個大型企業,進行相關資料收集與資料庫的建立,並對各個市場環境中,企業網絡統理的構成型態、運作功能以及如何因為所在區域的制度環境、市場結構、工業化進程、菁英網絡與全球化程度的影響而顯現不同的差異進行分析與比較。由於既有西方文獻關於此類的比較研究仍然相對鮮少,而特別針對亞太地區的網絡統理的比較研究則更未見有類似著作,因此進行一個跨亞太地區市場經濟組織的網絡比較分析,將在經驗研究的探索與既有企業網絡統理理論檢驗上做出貢獻。

這個研究主要想接續的是過去二十年來在西方社會學界極為蓬勃的經濟與市場的社會學研究傳統,為的是將目前西方社會學家對市場運作的理解與關懷,進一步推展到跨亞太區域的比較研究的脈絡中。這個研究也在某個程度上延伸本人的博士論文針對台灣的企業網絡所進行的一連串的研究,想要整合目前市場研究當中網絡論與制度論兩大傳統,探討我在博士論文當中所發展出來的架構用以分析亞太市場的適用性,並找出亞太市場企業統理的特殊性。

在目前社會學的研究文獻當中關於這個主題主要有以下的問題:首先,在 研究方法上,既有針對亞太地區的企業網絡研究,大部分仍是描述性、個案的 質化研究;目前還未見一個整合性、大規模且一致性的量化取向的研究。既有 的文獻大部分零散而侷限於各國的視野,尤其是針對東南亞國家的企業網絡分析幾乎不見重要作品。其次,在理論上,既有針對亞太地區的企業網絡研究大部分是過度社會一文化論的取向,解釋變項經常落於家族主義等問題意識,在理論解釋上尚有欠周延,許多政治權力、制度因素以及晚近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全球化等概念架構並沒有在既有的研究中被考量。

針對這些限制,我的研究計畫主要在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上進行改善,並 擴大視角,進行一個跨亞太地區企業網絡的比較研究。在理論上,我的理論架 構跳 脫 既 有 社 會 文 化 論 的 限 制 , 意 欲 更 宏 觀 的 檢 驗 企 業 網 絡 的 形 構 (configuration)與運作如何受以下四大因素的影響。

(1)制度環境:國家的角色與法令的規定經常是影響企業連結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本研究將探討亞太各市場網絡的內在結構與功能如何由外部的制度環境所限制。(2)工業化的進程:市場的發展不同階段通常蘊含產業部門間的資源差異,也間接的影響企業網絡構成的型態,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可地域的經濟工業化過程對企業網絡形成的影響。(3)地域性的社會結構:地域性的社會文化因素常是企業網絡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東亞地區家族文化業組織的影響通常體現在所有權與繼承權的型態選擇上。例如韓國以長男為主的家父長制的文化讓企業的權威結構傾向於垂直性整合與集中;而在台灣,由於華人家族的分家文化與關係網絡的習慣則讓台灣的企業網絡傾向於零散地域化。(4)全球化的路徑:而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整合與資金的跨國流動,越來越多的組織學者開始討論地域性市場統理結構是否因為資本全球化動助因素而日益趨同成英美的模式。雖然有學者倡議趨同的假設,但是零星而先驅性的幾個研究則顯現的相反的證據,也構成本研究測試的基準。

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之下,本研究試著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在企業網絡的形構上,存在有所謂泛亞太地區的特殊統理模式嗎?而這個統理模式又如何受制度環境、工業化進程、原生社會結構以及全球化程度所影響呢?而這個核心問題又可以分解成以下經驗研究的次主題來回答:

首先是地域市場的企業網絡基本形構的問題。亦即,亞洲各市場的企業網絡特色為何?各市場網絡連結的密度是否有明顯的差異?最大的統理團體涵蓋程度如何?組成份子是誰?而其中網絡組合的次團體型態是什麼?是分散性的區域團塊?還是大集團式的緊密連結?

其次,佔據各市場總體網絡核心的企業為何?是國營還是民營事業?是生

產與製造為主的企業,還是金融服務業?是家族性的企業還是專業管理人主導的企業?各地區的外資與法人投資又分別在網絡統理的位置中扮演什麼角色?

第三,企業董監事的連結網絡是否形成企業菁英的「核心圈」?哪一類的企業菁英最常董監跨坐?而這個企業菁英的核心圈構造為何?連結程度以及派系網絡型態是什麼?政治菁英與企業菁英分別扮演的角色為何?是否有族群經濟的差異?而華人與在地族群的統合是否呈現明顯的類型?換句話說,透過企業董監事連結的分析,可以進一步理解企業菁英的社會組織型態,與回答「是誰控制與統理亞太地區的大型企業?」這樣的問題。

第四:在資金流動全球化與管理模式的跨國流動的背景之下,各地區市場的網絡統理是否會因為全球化的程度而有所不同?而各地網絡統理模式是否逐漸趨同於歐美的模型?此外,隨著亞太地區跨區域式的經濟整合日益明顯,一個合理的問題是:亞太地區是否形成一跨國界的大型企業網絡?企業菁英的連結是否也超越地域的疆界,形成一個泛亞太地區的企業菁英階層?

在方法上本研究計畫對焦在亞太地區各市場的董監事連結做比較分析。為了使比較有一致性,本研究將訂定相同的樣本數 (預計為各市場的前兩百五十至三百大公司),針對同樣的網絡變項,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收集與測量,並對數據做比較性的解讀。初步選定的國家含括東亞的台灣、韓國,與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泰國。收集的資訊將包括企業董監事名單、大股東名單為主,俾得以事後建構董監連結的變項;並視各市場資料收集可及情況輔以企業的持股名單。

本研究時間預計分為兩年。第一年以基本資料收集、資料庫建檔與各市場二手歷史資料與研究文獻分析為主;資料涵蓋大型上市企業資訊以及各國市場發展與政治經濟等研究。預計在第一年結束後進行初步資料分析。第二年始將針對資料分析結果擬定田野訪問主題,並選擇東南亞一至兩個國家與東北亞的韓國做田野研究與深度訪談。

在預期成果方面,本研究從既有西方的市場與組織的社會學脈絡出發,以 亞太五國市場的企業董監事的網絡構成為分析焦點,不只可以檢驗既有市場與 組織社會學的研究理論在亞洲的適用性,同時亦更進一步的試著挖掘並回答泛 亞太地區的特殊統理模式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命題。這將是社會學家首次進行的 一個跨亞太地域企業網絡統理的比較研究。由於此類研究仍未見有類似著作, 因此預計將在經驗研究的探索與既有企業網絡統理理論檢驗上做出貢獻。

# 「越南的傳統建築與都市:中國文化、印度文化 在印度支那上的相遇」分支計畫簡介

#### 黃蘭翔

# 本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本計畫與我過去向本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所提的研究計畫不同,這是整理 過去研究成果的寫書計畫。暫訂的章節目次如文後所示。在此願意針對本書的 原委稍作說明。

本人自 1996 年以來,接受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之研究補助,前後共執行了「越南古代城市形成之歷史與其城市特徵之研究」、「越南、柬埔寨、爪哇島的印度教及佛教建遺跡調查研究」、「中國合院伽藍影響下的越南佛教傳統建築」關於越南傳統都市與建築之分支研究計畫。根據我個人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分析,逐漸採知越南從北到南,從古自今,從佛教佛寺至儒家文廟,從單棟建築到聚落都市的規劃,

從占婆族人、京族人到 16、17世紀移民前來的華人等不同種族的建築文化都存在不同的文化特質,表現出越南傳統文化之多重性格。因為我重視第一手田野的調查,儘管因為時間與各方面條件的限制,至少也取得了不少別人所沒有的實地資料,並發展出我自己現階段對越南建築文化的看法。在這段時間裡也逐年發表了數篇相關的論文,現在應是整理後再出發的時候了,因此向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提出撰寫專書計畫。

本計畫將以過去的研究成果與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為主進行專書的寫作。因為越南自古以來,以河內為中心存在有京族人為主,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北文化圈,中南部則存在以印度與南傳佛教為主的占婆文化,到了16世紀開始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又有南北鄭氏與阮氏政權的對抗,更增加了其南北文化異質性的特徵。關於這一部份的內容將在「第二章越南南北建築文化之特質」內敘述整理。

占婆王國的建築文化,將以我已經寫成的〈印度支那的印度教與佛教建築:越南中部占婆(Champa)遺跡〉(2000)為主,加上占婆文化與柬埔寨之吳哥

文化群的關連性,以我在〈中國早期佛寺與柬埔寨吳哥寺院伽藍配置的聯想: 寺院宇宙觀的水空間〉(2005e)論文中所論述的佛教、印度教宇宙觀的水空間 處理之概念,重新整理寫成本書的「第三章占婆王國建築文化的傳統」。

第四章與第五章則以越南主流文化的京族人的傳統建築為主,首先論述越南傳統村落的空間結構與其中心性的建築「亭」,與受中國影響村落的孔聖「先師廟」河內的文廟,以及北傳中國影響下的臨濟宗、禪宗的佛寺建築,在 20世紀後的新興宗教高台教的聖堂建築之分析。本章的另一重點是越南京族人在中部順化所創的最後一個王朝阮朝,其順化故都與其宮殿的建築之特質。這兩章節已有〈試提分析越南傳統「亭」建築的兩個必要觀點〉(2006)、〈17世紀河內佛教「主殿」空間原型之析出〉(2005a)、〈Two Transformed Elements in the Layout of Confucian Temple in Hanoi, Vietnam and Tainan, Taiwan〉(2005d)、〈越南順化佛教寺院的伽藍配置初探〉(2004a)、〈越南河內與順化佛教伽藍配置差異的背後〉(2005b)、〈越南高台教(Dao Cao Dai)眾神祭祀堂背後的歷史文化脈絡〉(2005c)、〈19世紀越南國都(順化)的城市規劃初探〉(1998b)、〈順化傳統古建築的特徵〉(1997)等論文。

第六章則以17世紀以後移民越南的華人建築文化為主,論述有歷史記載並建築文化有跡可尋的華人建築文化的特質與其變遷。因為越南在16世紀後南北政權的對抗,中南部的阮氏政權計畫引進中國東南沿海的華人,中國在面臨明末清初的變局時,亦有不少華人逃離中國前來越南開墾定居。關於華人的移民與定居及其所與建的建築與聚落,已有〈越南會安與台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1998a)、〈華人聚落在越南的深植與變遷:以會安為例〉(2004b)、〈大馬檳城、台灣鹿港、越南會安傳統店屋生活空間配置之比較〉(2002)等論文。

第七章結論部分除了把前面各章的結論重新簡潔整理於此之外,希望能將 本書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的越南建築史研究中找出它的位置。

專書目次暫定如下: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越南南北建築文化之特質

第三章 占婆王國建築文化的傳統

第四章 越南北部的古建築傳統

第五章 中世紀後中南部建築之發展

第六章 十七世紀後的越南華人建築傳統

第七章 結論

#### 相關著作目錄

- 1997。〈順化傳統古建築的特徵〉。《城市與設計》,2(3):97-141。
- 1998 a。〈越南會安與台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PROSEA Occasional Paper No.24)。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 1998b。〈19世紀越南國都順化的城市規劃初探〉。《文史哲學報》,48:1-40。
- 2000。〈印度支那的印度教與佛教建築:越南中部占婆(Champa)遺跡〉。收錄於蕭新煌主編:《東南亞的變貌》,頁 61-120。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 2000。〈陸海兩路「極樂世界」的營為——佛教寺院中的池水空間〉。發表於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0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5月11-12日。
- 2002。〈大馬檳城、台灣鹿港、越南會安傳統店屋生活空間配置之比較〉,《亞太研究通訊》,16:40-51。
- 2004a。〈越南順化佛教寺院的伽藍配置初探〉(與黃珠茵、黃鑑今合著)。發表於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4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4月22-23日。
- 2004b。〈華人聚落在越南的深植與變遷:以會安為例〉。《亞太研究論壇》,26: 154-191。
- 2005a。〈17世紀河內佛教「主殿」空間原型之析出〉(與黃皎怡、釋行心合著)。 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5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論文研討會」,4月28-29日。
- 2005b。〈越南河內與順化佛教伽藍配置差異的背後〉。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5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論文研討會」,4 月 28-29 日。
- 2005c。〈越南高台教(Dao Cao Dai) 眾神祭祀堂背後的歷史文化脈絡〉。發表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主辦「2005 第三屆亞太藝術論壇:眾「神」遊/戲的國度:亞太文化中的『偽裝』藝術」,10月8-10日。

- 2005d。〈Two Transformed Elements in the Layout of Confucian Temple in Hanoi, Vietnam and Tainan, Taiwan〉。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New Frontiers of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 國際研討會」,11 月 24-25 日。
- 2005e。〈中國早期佛寺與柬埔寨吳哥寺院伽藍配置的聯想:寺院宇宙觀的水空間〉。《亞太研究論壇》,30:126-186。
- 2006。〈試提分析越南傳統「亭」建築的兩個必要觀點〉。收錄於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編:《2004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論文集》,頁185-210。

# 「越南宗教的政治參與:以高台教、和好教為中心」 分支計畫簡介

#### 許文堂

#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越南長期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在宗教和民間信仰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即使西力東漸之後,對於由歐洲傳入的天主教的接受過程亦頗為雷同。因此,在越南民間社會的精神生活中,儒、釋、道、耶各教及民間信仰可說是主要的潮流,但是在20世紀中卻產生兩個新與宗教:高台教與和好教,二者都在南部發展,各自有為數達數百萬的信徒,成為重要的宗教,他們的政治參與對越南共和國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他們的命運也在南北統一之後發生重大變化。茲簡介於後:

#### (1) 高台教

在1920年代,越南南部出現一個新興的宗教——高台教,它統合了儒、釋、道、基督四大教義,並接納民間信仰中的神祇作為其教義中的使徒,這種開放性的綜合教義(syncretism)使其得以迅速發展,並確立自身在越南社會及宗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高台教(Dao Cao Dai)是一般教外人士對該教的稱呼,所謂的「高台」是指至上之神的居所,至上之神或以名之,可稱作「高台仙翁」或「高台上帝」(Cao Dai Thuong De),教內神職人員則稱之為「AÁÂ」,祂代表了上天或上帝或造物主對於人類的第三次普度,因此教名為「大道三道普度」(Dai Dao Tam Ky Pho Do)。所謂的第一次普度是指在兩千五百年以前,分別由佛教之燃燈古佛(Nhiem Dang Co Phat),道教之太上老君(Thai Thuong Dao Quan),儒家之伏羲(Phuc Hi),及基督教之摩西(Moses),代表開啟。第二次普度是由釋迦牟尼佛(Sakyamuni)、老子、孔子、耶穌分別創教,以救世人。現在乃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普度,由上帝決定統合所有宗教,消除世界的隔閡,建立一個天上地下皆為博愛公平的世界。由於祂超越了所有的宗教,故謂之為大道。

高台教的創立應歸諸幾位靈魂人物。首先是吳明釗(Ngo Minh Chieu, 1878-1932)又名吳文釗(Ngo Van Chieu),他是身受越、漢、法三重文化洗禮的知識份子,接受法國在西貢的殖民學校 Chasseloup-Laubat 訓練之後,進入殖民政府官僚體系。在1920年,他在派赴富國島(Phu Quoc doi)任知府職的期間,因為參加扶鸞(Pho Luan)而感受靈召,從此熱中此道。 在1924年他調回西貢時,即以此類聚會的靈驗而號召了不少人,其中許多是傳統知識份子或在殖民政府中任職。

根據吳明釗傳授的扶鸞降神方式,乩筆多次以「AÁÂ」的身分出現,表達了建立新宗教以普度世人的期望,因此一群士紳頭面信徒正式向交阯支那殖民政府登記成立新宗教,並在報紙刊登廣告。但是吳明釗的姓名並未在此一公開信中。據稱,由於新任總督 Alexandre Varenne 力邀吳明釗進入總督府第二局服務,而第二局職司情報,因而致使一些高台教的上層神職懷疑吳明釗為殖民政府蒐集教內情報,指控其「背叛」,而逼迫吳交出權力。

建教伊始即蒙上分裂的陰影,高台教的宗派主義也一直成為日後的發展阻礙。以吳明釗而言,他在1928年退出殖民政府,遷到芹且(Can Tho)另立支派。

黎文忠(Le Van Trung, 1875-1934)也是西貢 Chasseloup-Laubat 學校出身,殖民官吏的便利使其在經商獲利不少,但無度的揮霍損害了他的健康,幸而吳明釗的降神及乩筆使黎文忠幡然悔過,決意信奉高台,並成為擔任頭使(Dau Su)的重任,負責建立聖堂。

1926年11月黎文忠在距西貢西北九十公里的西寧省鵝堅縣(Gô Kèn)慈林寺(Tù-Lam Tu)將此一佛教寺院轉化成高台教的第一個殿堂。此時高台教已有信眾一萬多人。1927年3月,黎文忠並依神啟在龍城(Long Thamh)黑婆山(Nui Ba Den)附近購得百公頃林地,開始建築高台聖殿。

1929年,新任的交阯支那總督 Krautheimer 決意干預這股日漸龐大的宗教力量,以各種理由進行調查,最後將黎文忠投諸獄中,但僅一日即因各方聲援,而將黎釋出。這些不必要的阻擾宗教自由,使高台教內逐漸昇起一股反法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日後爆發出來。

黎文忠在 1930 年擔任「權教宗」(Quyen Giao Tong),暫攝教宗之職,直到 1934 年 11 月 19 日蛻化。 其後一年,西寧教派推出人稱「德護法」(Duc Ho Phap)的范公稷(Pham Cong Tac, 1890-1959)為繼任領導。

范公稷 (Pham Cong Tac, 1890-1959) 也是西貢 Chasseloup-Laubat 中學畢業生,曾經在西貢海關擔任低層文員。1925 年間,范公稷及其詩社友人沈迷於扶鸞召神,終於得到高台上帝「AÁÂ」的指示,與吳明釗等人成立高台教。1926 年 9 月 29 日,范公稷等 247 人宣布成立高台教,10 月 7 日並將一份法文宣言送交交阯支那殖民政府要求立案。此後范公稷一直和黎文忠是西寧教廷成立的最重要力量,因此,在黎文忠蜕化之後,范公稷即以協天台護法一職,成為領導為數高達兩百萬高台信眾的最高權力者。

范公稷成功的發展了幾位法籍信徒,其中一位作家 Gabriel Gobron 被任命為「接引道人」(Tiep Dan Dao Nhan),代表高台教出席了 1936 年的倫敦世界宗教大會(World Congress of Religions),1934 年巴塞隆那(Barcelona)及1937 年格拉斯哥(Glasgow)的世界靈學大會(International Spiritualistic Congress),使得高台教的世界知名度大為提高。

數目龐大的信徒和日漸高昇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使殖民當局採取格外嚴密的監控措施。尤其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新越革命黨」、「越南國民黨」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相繼成立以來,證實加強防範的必要性。 此時,流亡日本的尊室彊柢(Cuong De)及其「復國黨」(Phuc Quôc)找上范公稷,尋求支持。另一方面,法國警方對於西寧聖堂的搜索行動,則更加強神職人員的民族情緒,使高台教傾向與復國黨合作,藉此得到日本的支持。 終於,護法范公稷對於信眾加入「復國黨」一事表示同意。事實上護國黨雖以長期流亡在日本的彊柢親王為首領,卻處處受日本「黑龍會」的節制,表面上以民族主義的號召,卻只能擁護「大東亞共榮圈」的日軍政策,利用日軍力量推翻法國殖民政府,希冀從而得到獨立自主,實無異於幻想。

1941年5-6月間,在三名日本外交人員訪問西寧聖堂不久之後,法國殖民當局逮捕范公稷為首的六名高層神職人員,將他們流放至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方才釋回。

1946 年至 1956 年之間, 范公稷不僅是高台教的最高領導, 也積極介入政治, 希望為越南尋求和平。但是越共的暗殺活動, 以及吳廷琰政府的宗派戰爭使得范公稷選擇避居柬埔寨, 但仍然掌控西寧高台教務, 直到 1959 年 5 月去世。

高台教的武裝力量是由配使陳光榮 (Tran Quang Vinh, 1897-1975) 所建立,希望藉此力量自保,甚至推翻法國殖民當局,達到越南獨立的目標。此時,日本在東南亞的軍事勝利,成為一種極具說服力的選擇,尤其日軍當局對法屬

印度支那的步步進逼,使這些高台教徒看清法軍力量的薄弱,企圖揭竿而起放手一搏。

1942 年 11 月,陳光榮接洽進駐西貢的日軍當局,組織一批青壯高台教徒前往西貢的日軍船塢工作。這批為數達一萬名的青壯年由日軍施以軍事訓練,其中三千餘人形成高台教的早期武力,日後並發展形成一支數量號稱高達五萬人的軍隊,並參與了日軍在 1945 年 3 月 9 日對法屬印度支那的突擊接管行動。高台教和日本軍的聯合行動似乎和長期流亡日本的阮朝宗室彊柢的促成有關,但是這次的「勝利」並沒能持續太久,五個月後日本即宣告無條件投降,高台軍隊的戰爭方要來臨。

戰後,英軍協助接收南越,並將之移轉給重新回到越南的法軍,將甫成立不久的「越盟」(Viet Minh) 臨時政府視如無物,因此戰事立即開啟。而臨時組成的「越盟」內部各派勢力也未能合作,各為已謀的結果是法軍的節節勝利。1945年10月15日,法軍攻進西寧,劫掠聖城,並殺害5名神職人員。此時,陳光榮恰巧被越共於月初逮捕囚禁,也因此得以逃過一劫,直到次年2月間方告脫逃成功。但在5月間又被法軍在西貢堤岸逮捕,面對兩面夾攻與滅教之難,陳光榮選擇和法軍妥協。雙方在6月簽訂聯盟,法越當局允許范公稷等返國,容許自由傳教,歸還各地所有查封的高台教堂,停止對高台教徒的不公平待遇。至於高台教武力則停止攻擊法軍,除保留一部分自衛部隊之外,其餘編入法軍後備武力。

對於越共而言,高台教此舉無異於叛國,因此展開慘烈的屠殺報復,大批鄉村高台教徒因而被殺。高台教徒也在德護法范公稷的號召下,加入反共行列,捍衛家園。法越當局也將西寧、美荻(My Tho)兩省管轄權,包括稅收、駐軍,交由高台教負責。

1954年6月19日,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任命吳廷琰(Ngo Dinh Niem)為總理,1955年初吳廷琰先說動高台教派(范公稷、阮成芳)以及和好教派(Hoa Hao),共同對付平川(Binh Xuyen)教派。至4月間,平川派黎文遠又與和好派鄭明世、黎光榮共同組成「民族解放聯合陣線」,企圖推翻吳廷琰。但政府軍在唐文德領導下,迅速攻進平川教派陣營,瓦解平川的武力,首領黎文遠。10月,吳廷琰當選總統,高台軍隊將領阮青鳳(Nguyen Thanh Phuong)不顧范公稷的反對,與吳廷琰談判解散軍隊。自此至1963年11月,吳政權被軍事政變所推翻前,西寧派的高台教徒基本上和南越政府合作。但它的武力也已

自盛極一時的 25,000 人,縮減為僅只 1,000 人的聖堂警衛。然而高台教徒的政治參與力量絕不可忽視,歷任政府組閣均少不了高台教的成員參與或背書。

自 1975 年越共統一全越後,大批高台神職及信徒流亡海外,西寧教廷的情況也難為外界所了解。不過由於高台教長期和共產黨對抗的歷史看來,信徒必然有段艱困的時期。

#### (2)和好教

和好教(Hoa Hao Boudhism)通常被視為佛教的一支,他們的教徒也自稱是「和好佛教」(Phat Giao Hoa Hao)屬於改革的新興教派,其得名來自它的發源地,昔日的朱篤(Chau Doc)今改名安江(An Giang)的和好村。和好教戒律簡單,主要守五戒(殺、盜、婬、妄、酒),尊奉三寶(佛、法、僧),和一般佛教相似,所以在湄公河(i.e.九龍江)下游平原各省如安江(An Giang)、同塔(Dong Thap)、芹苴(Can Tho)、永隆(Vinh Long)、堅江(Kien Giang)諸省蓬勃發展,至1975年,據信有兩三百萬信徒。由於和好教長期反共的立場,使其在統一後的發展受到壓抑,目前越南官方的統計,信徒數也已超過百萬之眾。

起先,和好教是以「乩」(男性)「巫」(女性)祈神問佛的靈媒事蹟來傳播信仰,其中以黃富數(Huynh Phu So)影響最大,是和好教的創始者。

據知,黃富數出生於1920年,家中為朱篤的地主。自幼聰穎,可惜健康不佳,加上個性喜好清靜,因此青年時期即離家雲遊,上山採草藥,鑽研耆黃之術,用以度已救人。據說他還特別精通阮秉謙的預言書,所以通曉過去未來,後得「寶山奇香」(Buu Son Ky Huong)思想,使他得到開悟,創立和好教。

雲遊歸鄉之後,黃自稱能知過去未來,阿彌陀佛及玉皇大帝飭令他拯救世人。他宣傳「孝義四恩」(Tu An Hieu Nghia)及敬重三寶(佛、法、僧)的簡單因果報應思想。年屆 20 歲時,黃富數在自家開創和好教,據說在 1939 年至 1945 年間,和好教迅速發展,信徒有七十萬人之眾(也有說超過百萬之眾)。信徒眾多的原因可能和日本軍的暗中支持有關,第二次大戰前夕及戰爭期間,日本軍方鼓動越南群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對法國殖民者,並利用這種被操縱的情緒吸引越南人到日軍在越南的一些機關設施工作。在 1945 年 3 月日軍全面控制越南以後,也利用和好教在九龍江平原推動農業改良,因此也得到許多農民的支持。

和好教在戰後也有自己的政黨組織「社會民主黨」,並擁有一隻「保安軍」

(Bao An Quan),兵力一度高達二萬人之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 1975年間,和好教徒高度參與了越南政治,將越南政局的變化和和好教的發展緊密的連結在一起,他們的反共立場也無可避免的造成在越共統一越南後整個教派的悲劇命運。

和好教作為一個新興宗教並不重視經典(Classic Dharma),也不認為教徒和教主與佛之間需要一種宗教階層建制(Clergy and Church Organizations),這一點似乎和尊敬三寶中的「法」與「僧」二者有些矛盾?無論如何,和好教重視的是自我的覺醒與實踐,知父母、祖先、國家、同胞、人類對於一已之恩,努力行善做人,因此無須繁複的階層組織。

和好教徒的家庭通常是在正廳供奉佛菩薩、祖先牌位,一如傳統越南家庭,每日供奉淨水、香花,晨昏兩次誦唸「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淨土真言。教徒如果不能長期茹素,至少每月持齋6日或10日的素食,並且嚴忌食用牛、虎、貓、鼠之肉。

1946年,黃富數及其信眾創建越南社會民主黨,由阮保全(Nguyen Bao Toan)為首,成立一支擁有二萬兵力的「阮忠直軍」及各地方民防的三萬保安軍。不幸黃富數在1947年,在一次和共產黨的談判後被殺,遂使和好教軍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經由幾名大將分別治理。

到了 1955 年,吳廷琰政府對地方武力如高台教軍,和好教軍,平川教派 軍進行收編掃蕩,致使和好教將軍黎光榮 (Le Quang Vinh, alias Ba Cut)被 殺,導致教軍解散。

在吳廷琰政府倒台後,1966年起美軍又扶持和好教梁重長(Luong Trong Tuong)以及社會民主黨。但在1967年,黃文任(Huynh Van Nhiem)另立山頭,1972年,黎光廉(Le Quang Liem)又再次造成和好教的分裂。自此,和好教派分成三支,總共有超過兩百萬的信眾。

從1945年和好教成立「國家統一陣線」(Mat Tran Quoi Gia Thong Nhat)以來,和好教即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46年改名成立「社會民主黨」(未知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有何相似的政治綱領?),直到後來分裂成三星黨、卍字黨三大派,都企圖利用宗教力量在政治版圖佔一席之地。

# 研究目標

高台教義混合了各派教義,它也融合了越、華、柬、法等各種族的信徒,

#### 208 亞太研究論壇第三十一期 2006.03

容納了各種可能性的發展。和好教則自稱為佛教的一個改革宗派,活躍於南方農村。快速的發展得力於其領導階層,樸實的教義,嚴密的組織,應許或應驗的乩言,以及其對政治的參與。

高台教與稍後出現的和好教所與起時期正是越南變動的時代,其信徒對獨立自主的追求,在法國殖民者統治下的合作與抵抗,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和日軍的合作,戰後和越盟、南越各政府的關係,對於外界而言無不充滿神秘色彩,反而不若其教義的簡單明瞭。抽象的政治與宗教概念可以從實際存在的政府與教會組織來觀察兩者之間的權力運作,是退讓?衝突?或是調和?

問題是,如果不是因為戰爭,使高台教與和好教徒的民族主義立場在選擇合作對象時與共產黨徒不同,教派在日後就能得以與盛的發展?作為一個宗教為何需要武裝力量自保?對於統治當局而言,如此的宗教運動也是一種群眾運動、一種社會運動,這樣大規模的動員方式又和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與起有所關聯,使得統治者必需面對這個新興宗教勢力。這兩個教派都擁有武裝力量,並且積極參與政治。對於教徒而言,政治參與一方面是求得發展,至少也自保的一種手段?

# 「越南人的社會價值觀及其對子女的教養態度」 分支計畫簡介

#### 柯瓊芳\*、張翰壁\*\*

根據台灣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自 1987 年 1 月至 2003 年 8 月 31 日止持有效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已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越南籍配偶,經實際確認後共計 54,527 人,占台灣外籍配偶(大陸地區除外)總人口數的 54%。這些越南籍配偶以女性為主(99.9%),現年約 24 歲,絕大多數為初婚(99%),平均與其台灣籍丈夫結婚約 2~3 年,顯示其結婚年齡在 22 歲上下;而其台灣籍丈夫的年齡為 38 歲左右,夫妻年齡差距約在 14 歲上下。與台灣籍女性結婚的越南籍男性數量極少(84 人),平均年齡與結婚年數分別為 32 歲左右與 4~5 年間,顯示其結婚年齡約在 28 歲上下。較為特殊的是,這些越南籍丈夫的年齡反而低於其台灣籍妻子 2 歲左右。此外,絕大多數的越南籍妻子是經由仲介或親友(簡單)介紹而認識台灣籍丈夫的,夫妻間婚前的認識不深,對台灣的語言與文化熟稔程度也不高。

至於教育程度方面,越南籍妻子的學歷以國中以下為主(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三),而其台灣籍丈夫的學歷則以國中及高中為主(約八成左右)。絕大多數的越南籍妻子沒有出外工作,但隨著在台居留時間的增長以及語言駕馭能力的提升,出外工作的比例有升高的趨勢。而與台籍女子結婚的越南籍丈夫,其教育水準以國中與高中為主(約八成左右),他們的台灣籍妻子的學歷,亦以國中及高中為主(約七成左右)。大致說來,娶越南籍妻子的台灣男性以從事於第二及第三級產業為主,但亦有一成以上的人從事於第一級產業(台灣總人口中只7.8%從事於第一級產業)。訪問資料同時顯示,這些越南籍配偶(與台灣籍配偶)共生了四萬餘個小孩,這些小孩平均年齡約在1-2歲左右。

世界銀行資料顯示,2002 年越南總人口8100 萬,國民平均所得美金430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World Bank 2004)。但卻有充沛的勞動力人口(15-64 歲人口占總人口的64%),以及超過九成以上的成人識字率(15 歲以

<sup>\*</sup> 本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sup>\*\*</sup>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本專題中心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上人口之識字率分別為男性 95%、女性 87%)。Wisensale (2000) 認為越南人民自古以來便過著雙重的生活。在過去的一千年中,政治上分別受到中國、法國、與美國的殖民統治,在文化上受到中國、印度、法國、及美國的感染,而在宗教與藝術方面則受到佛教、儒教、道教、回教、及基督教的影響。今天,超過一半以上的越南人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生的,所處的是一個既有社會主意色彩又富含資本主義氛圍的經濟環境,但不管如何,家庭仍被普遍視為社會的核心。1946 年的憲法中曾明文規定,家庭是社會的核心,國家有責任保護家庭與婚姻。而 1959 年頒佈並於次年施行的婚姻與家庭法中,更進一步規定一夫一妻制為唯一的合法婚姻形式,禁止一夫多妻制,解除家長安排的傳統婚姻(或買賣式婚姻),強調所有的男性與女性都有選擇伴侶的自由。此外,所有國民都應遵守性別平等的規定,而弱勢的兒童也受到特別的保護。

1986年的婚姻與家庭法修正條例中則進一步規定,越南國民可以跨越族群與宗教結婚,但有血統關係及精神疾病者不得通婚。非婚生子女經由認領後,其權利義務與婚生子女等同,外國人若與越南人結婚,需遵守越南婚姻與家庭法的相關規定。此修正條例中亦詳細述明父母、祖父母、子女(包括領養子女)、及孫子女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1992年則規定外國人不得領養或監護越南兒童。

統計資料顯示,1960-1970 年間越南的總生育率為 7.3 左右 (VNDHS 2002)。為了減緩因人口快數成長所帶來的經濟壓力,越南政府開始進行家庭計畫,希望到 21 世紀時能達到人口零成長的目標。依憲法規定越南女性年滿十八歲即可以結婚,但政府及相關單位積極鼓勵女性到二十歲才結婚,於婚後兩年再生頭胎,並於五年後再生第二胎。兩個子女是政府提倡的理想生育數,並積極推行以 IUD 做為生育控制的手段。經過數十年的努力,1998-2002 年間越南的總生育率降為低於替代水準的 1.9,且教育程度愈高者生育率愈低,鄉下地區生育率則略高於都市地區。

雖然在文化上越南深受中國及儒家思想的影響,但 Hirschman 及 Loi (1996)的研究則發現,近代越南的家戶型態以核心家戶為主,婚後也不一定與夫家親戚同住。此可能與西方殖民文化有關,但也有可能是受到東南亞文化的影響。Ghuman (2005)在越南 Hai Dung 省的研究則發現,多數受訪者對於婚姻外性關係的態度仍非常保守,但年紀愈輕者接受度愈高,且男性的平均接受度高於女性。不過,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與即將結婚的對象有性關

係是可以接受的行為。Ghuman 的研究也發現,在 1976~1985 年結婚的受訪者中,只有 4%的人曾有婚前性關係,但 1993-2000 年結婚的受訪者中,則有 15%的人有婚前性關係,教育程度較高、家庭經濟狀況較好者,有婚前性關係 的比例也較高。

越南雖在歷史上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其過去一百年來的經歷卻是西方文化影響大於東方。而多數迎娶越南籍妻子的台灣男性也認為越南女子除了在體型外貌上與本地人相似外,其文化價值觀也與台灣相去不遠。可是歸諸於語言隔閡與文化差異的夫妻爭吵與家庭紛爭也時有所聞,那麼到底越南人的社會價值觀如何?他們對於家中長輩的敬重態度如何?他們對於婚姻和諧與子女教養的態度又是如何?這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

陳銘真與 Do Thi Hoang Lan (2005) 認為雖然自十三世紀以來儒家教義是越南的思想主流,但法國與美國的前後殖民與統治帶來了西方文化的洗禮,父權制度與傳統的大家庭結構受到挑戰,南北越分治時期的長年戰亂使得原有的性比例失衡,間接促成了女性出外就業的機會,也使得傳統男尊女卑的價值觀逐漸消蝕,附加上人口激增的壓力,避孕與小家庭制度變為流行,尤其在都市地區。分析台中市及台中縣國小一至五年級學生及其家長、老師後,蔡盈修(2005:27) 發現越南新娘認為「在越南,男人除了會賺錢,在家裡是很沒有用的,所以越南女人在家中一般是很強勢」。他同時也發現,越南新娘一旦在台灣克服了語言困難就會尋求自立,在小孩的照顧上也多不假手他人。進一步分析則發現,父母的婚姻關係、經濟情況、照顧模式、及照顧品質等對兒童的交友關係有相當直接的影響。而就個人行為發展的角度來看,幼年的交友經驗會影響其未來的心理健康與對外在環境的適應。

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男性與外籍女性(尤其是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結婚的趨勢在過去十年間成長迅速。以越南籍妻子為例,1993年只有47位,1995年增為472位,1997年增為1995位,2001年超過一萬位,2002年略減為9876位。長此以往,不但越南籍女性在台灣人口數會持續增加,台越婚生子女人數也會跟著成長。這些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生活適應如何?其將又以何種社會價值觀來育養子女?這是相當值得重視的新社會現象,需要相關學者做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但更根本溯源的問題是,這些越南籍配偶所處之原生社會的家庭結構、婚姻與敬老態度、宗教信仰、子女性別偏好、以及對於子女的期望與教養態度又是如何?本研究除了引用越南政府的統計資料,以及相關學者所進行的

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1-40。

調查研究資料外,亦將於 2006 年春季前往越南,以深度訪談方式進一步探討一般越南民眾對於台越婚姻的看法與動機,以及在跨國婚姻下,外籍配偶如何綜合雙邊文化達成生命的和諧與生活的滿足。

# 參考書目

-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灣:學群出版社。
- 柯瓊芳。2003。〈20 世紀 90 年代台灣與大陸社會價值觀的比較分析〉。收錄於 盧曉衡主編:《三教圓融兩岸一體》,頁 307-326。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徐正光、蕭新煌。1995。〈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台北地區的調查分析〉。《民
- 馬克思、恩格斯。196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 社。
- ———。196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信木。2003。〈台灣地區客家人口之婚配模式:世代、地理區域與社經地位比較分析〉。行政院客委會講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陳銘真、Do Thi Hoang Lan。2005。〈從傳統到現在:越南婦女勞動、性別關係與文化價值觀之轉變〉。論文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5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4月28日至29日。
- 張翰璧、柯瓊芳。2005。〈經濟與文化全球化下的語言與族群建構:以桃竹苗地 區客家族群為例〉。論文發表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主辦,「2005年全國 客家學術研討會:學術定位、社會脈絡與經驗探索」,5月26日至27日。
- 蔡盈修。2005。〈台越婚姻子女照顧與社會化〉。論文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5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4 月 28 日至 29 日。
- Bourdieu, Pierre.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_\_\_\_\_.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Ghuman, Sharon. 2005. Attitudes about Sex and Marital Sexual Behavior in Hai Dung Province, Vietnam.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6(2): 95-106.
- Giroux, Henry. 1983.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 Garvey.
- Hirschman, Charles and Vu Manh Loi, 1996. Family and Household Structure in Vietnam: Some Glimpses from a Recent Survey. *Pacific Affairs*, 69(2): 229-249.
- Teski, Marea and Jacob Climo. 1995. *The Labyrinth of Memory*. Westport, Conn.: Bergin & Garvey.
- Vietnam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VNDHS). 2002. Hanoi and Calverton, MD: Committee for Population, Family, and Children and ORC Macro.
- Wisensale, Steven K. 2000. Family Policy in a Changing Vietna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1(1): 79-90.
-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uval-Davis, Nira. 1997.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越南革新開放後的社會階層化:以跨國女性移工的 社會地位變化為例」分支計畫簡介

#### 王宏仁\* 龔宜君\*\*

## 一、過去一年的資料閱讀與蒐集

三月至四月:計劃報到、聘請助理等行政事宜,蒐集國內外女性移工之相 關文獻。

五月至六月:設計田野訪談問卷,以及進行國內的訪談。準備與聯絡越南 訪談對象。

七月至八月:準備田野訪談各項聯繫工作。7月28日至8月22日,至越 南河內及胡志明市進行田野訪問。

九月至十月:整理田野訪問及蒐集到之文獻資料。

# 二、七至八月期間的田野調查

王宏仁與龔宜君分別在北越與南越的地方進行相關的田野調查。北越以越 南人,南越以台灣人訪談為主。

# 三、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

- (1)王宏仁與龔宜君在田野調查回國後,適逢發生高雄捷運的泰國勞工抗議雇主剝削事件,在媒體上發表三篇評論文章:〈台灣,全球血汗工廠中心〉(聯合報 2005.08.24);〈移工政策的破洞〉(中國時報 2005.08.29);〈We Should be Ashamed of Treatment of Migrants〉(Taipei Times 2005.08.25)。
- (2) 王宏仁與加拿大學者 Daniele Belanger 共同合寫了一篇論文 〈Pricing Migrant Workers in an Uneven World: Who Benefits from Labor Import-export Industry in Vietnam and Taiwan?〉,在 2005 年 10 月 14-16

<sup>\*</sup>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本專題中心九十四、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sup>\*\*</sup>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本專題中心九十四、九十五年度分支計畫主持人。

日於 Canadian Counci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主辦的雙年度研討會上 發表(會議主題: Re-visioning Southeast Asia: Conflicts, Connections and Vulnerabilities, October 14-16, 2005,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 Sino-Siamese Rel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Siamese Society during the Reigns of King Taksin and Rama IV (1768-1868)

#### Erika Masuda

Postdoctoral Fellow, CAPAS, Academia Sinica

# I. Background

Recent studies in pre-modern <sup>1</sup> Siamese history ascribe Siam's prosperity since the Ayutthaya period (1351-1767) mainly to flourishing foreign trade. Those studies direct attention to Ayutthaya's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emphasize pragmatic attitudes of the Siamese monarchs (Sarasin 1977; Cushman 1993). However, it is paradoxical that the dynastic chronicles, especially those of Ayutthaya are practically silent on the subject of Siam's commercial activiti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despite the great wealth and prosperity brought to her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Due to this scarcity of vernacular documents, information about Siam'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pre-modern period is dependent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penned by foreign officials, traders and sojourners of the kingdom.

Chinese sources have also been of great help in describing Siam's flourishing maritime trade and have revealed a wider perspective of the maritime networks of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of which Siam was a part, and

<sup>&</sup>lt;sup>1</sup> Usually, the term "pre-modern" era in Siamese history is defined as the period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the Bowring Treaty with Britain in 1855, which brought Siam into full involvement with western diploma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Siam's relation with China, this classification is also valid because in the year of 1854 the last tributary mission to China came back to Bangkok and it was the experience of the envoys that made Siam decide to secede from the Chinese tributary order.

which remained unrecorded by Siamese chroniclers. Former studies on Sino-Siamese relations, which utilized Chinese documents focus primarily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and show that Siam's maritime trade with China, which began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the form of a tributary relationship, involved the regular dispatch of tribute missions until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are two main contributions by former studie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iamese junk trade. The first is to prove the predominant position of external trade in the form of a crown monopoly for the economy of the Siamese court. The second is to demonstrate the role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traders who engaged in the Sino-Siamese junk trade and their partnership with the Siamese ruling clas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point how Siam viewed her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the paucity of documents on the Siamese side obstructs attempts to provide a straightforward explanation of Siam's own external view.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Siam's real motive in maintaining her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as to gain commercial profit, yet it must be noted that Siamese rulers' indigenous view toward China has not yet been fully examined.

Then, can it be possible to hear "Siam's voice" which manifests Siam's awareness of her relations with China? I give attention to the term "chim kong" which was transliterated from the Chinese term jin gong/進貢 which means, "to pay tribute to the Chinese emperor as the chief of a vassal state."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usage of this term is often observed in royal letters of the Siamese kings to China between the fall of Ayutthaya in 1767 and the end of Siamese tributary missions to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period of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Siamese junk trade. Seeking "hong (feng/封)", or investiture from the Chinese emperor, was an important royal tradition for early Rattanakosin kings until the last tributary mission was dispatched in

1852.<sup>2</sup> Thus, I explore the process of Siam's diplomatic contacts with China to construct a clear picture of the indigenous Siamese diplomatic view of China during these periods by utilizing both Siamese and Chinese documents in my dissertation, "Siam's 'Chim Kong', Sending Tributary Missions to China, A Study of the Diplomatic Aspect of Sino-Siam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Thonburi and Early Rattanakosin Periods (1767-1854)".

Former studies in pre-modern Sino-Siamese relations emphasized that Siam followed the tributary formality of China in order to attain commercial profit and rejected the ideology of tribute when she was away from China.<sup>3</sup> However, through examining Sino-Siamese diplomatic exchange during the reigns of King Taksin (r. 1768-1782) and Rama IV (r. 1851-1868), the first point to notice is that even while the Siamese monarchs very much concerned with their tributary or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the attitude of them toward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was not "rejection" but "indifference" in their "Siamese-centric" worldview.<sup>4</sup> The point I wish to insist is the fact that before Western diplomacy wedged itself into Asia, nobody in Siam could find "chim kong" to be shameful since Chinese political ideology did not exercise direct influence over actual political and social scenes within the political sphere of Siam and a transliterated term "chim kong" could be ambiguously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liking of the king of Siam.<sup>5</sup>

<sup>&</sup>lt;sup>2</sup> Studies based on Chinese sources show that King Taksin provide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arly Rattanakosin dynasty and China. For example, see 莊 (1975).

<sup>&</sup>lt;sup>3</sup> For this point of view, see, for example, Toby (1991: 202).

<sup>&</sup>lt;sup>4</sup> Yet, it is necessary to note that after the fall of Ayutthaya in 1767 Chinese intermediar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o negotiated directly with Chinese officials in Guangzhou and Beijing had to be more sensitive to Chinese reactions than in preceding ages. Since the tributary order was disrupted by the Burmese devastation of Ayutthaya, China was aware of the extinction of the Royal line of the kingdom. This Chinese response was the first instance in the history of Sino-Siamese interaction, and King Taksin's endeavor to reopen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as not easily accomplished. As a result of the war, the officials in the Siamese court who were in charge of dealing with contacts with China had to cautiously handle the diplomatic aspect of paying tribute.

<sup>&</sup>lt;sup>5</sup> Thongchai keenly pointed out that in pre-modern Southeast Asia, interkingdom

Then, the question arises of what meaning or value was ascribed to seeking "hong" from the Chinese emperor and sending envoys of "chim kong" by the Siamese ruling class during the frequent dispatch of tributary missions to China. It is known that since the Ayutthaya period, when Siamese rulers sent envoys to foreign countries by sea, the process of holding a splendid ceremony of engraving a golden missive of the king and conveying the letter and gifts to an envoy's ships by way of a magnificent procession was regarded as indispensable.<sup>6</sup> To perform this ceremony was one of the occasions for showing legitimacy of the king's powerful seizure of the throne. It is likely that the processions of "chim kong" that were dispatched from the royal palace and marched along the city of Bangkok to the Chao Phraya river once a year were impressive scenes which embellished the king's power by stress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brought wealth to Siam by the junk ships of "chim kong".<sup>7</sup> In other words,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ambiguity of the term "chim kong" allowed Siamese rulers to embellish their power by "hong" from the Chinese emperor without adapting themselves to the political order under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Former studies on Sino-Siamese mutual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Thonburi and early Rattanakosin periods tend to overlook th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chim kong". This is partly because it was crucially important for Asian countr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deal with the realities of Western power, naturally, it follows that Siam's

relationships were operated via the medium of gifts and these gifts could be decoded according to the liking of givers and receivers (Thongchai 1994: 87).

<sup>&</sup>lt;sup>6</sup> The following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ceremony of dispatching the king's envoy to a foreign country. "....on April 22, 1644 a gold-framed sovereign letter and gifts to the Shogun were brought on board a junk with a grand ceremony. Upon departure of the ship, many send-off speeches were given and prayers were offered for safe voyage." Iwao (1963: 13).

<sup>&</sup>lt;sup>7</sup> We may say that in the early Rattanakosin period there existed two aspects or embodiments of China: one represented by Guangzhou, a place for trade and commerce; the other represented by Beijing, a place for gaining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prestige.

indigenous diplomatic 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in relation to foreign countries during these periods have not been fully examined. My study of the diplomatic aspects of Sino-Siamese relations shows that there is still a need for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various aspects of Siam's world view during the pre-modern period, which have often been "rejected" after the advent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picture of Siamese history in those ages.

#### II. Research Plan

In his study of literary change and its social causes in the early Rattanakosin period, Nithi persuasively describes the cosmopolitan, urban and outward-looking culture of Siam during the era. His convincing and lifelike description based on careful exa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Siamese documents has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from mere reconstructions of traditional Ayutthaya society or mere preludes to the "new Siam",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ithi 1984: 21-23).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acknowledge voices which convey perspectives particular to the people and society during "old Siam" when we try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era. Since I wish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y-sided characteristics of Siam'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ir impact on Siamese society during the reigns of King Taksin and Rama IV, I will explore the following topics by looking more carefully into contemporary sources in Siamese,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 1. The Ritual Aspect of Siam's Tribute to China

From the pre-modern Siamese point of view, the ritual aspect of diplomatic exchange w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er interac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o sight a simple example, throughout the testimony of tributary envoys to China in 1843, there is a display of extraordinarily great interest in the ceremonial aspects of "chim kong", such as gift exchange and

diplomatic reception which occurred in China.<sup>8</sup> It could be said that Siamese envoys, who joined in the tributary rite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were impressed by the grandeur of each ceremony and ardently absorbed their feature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what element of the tributary rites of China attracted the Thonburi and early Rattanakosin monarchs. This question will be considered mainly through a study of Chinese documents regarding tributary rites,<sup>9</sup> testimonies and poems of Siamese missions to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to China, as well as Siamese documents which depict the receptions of foreign envoys.

#### 2. The Chinese Nobles in the Siamese Court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Siamese ruling class and the Chinese merchants of this period formed a successful partnership in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interests such as investing in the junk trade and tax farming as the newly emerged bourgeoisie during the Thonburi and early Rattanakosin periods. A curious point to observe is that the genealogies of most of the prominent Chinese families cannot be traced back before the third reign (1824-1851) of the Rattanakosin dynasty.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was discontinuity in the Chinese nobles who served the Siamese court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rth reign and, possibly, the Chinese during the first two reigns (1782-1824) were absorbed rather quickly into Siamese society. To explain

<sup>&</sup>lt;sup>8</sup> Interestingly, the degrad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prestige due to the Opium War and the loss of economic privilege of trade in Guangzhou under the tributary system did not change the prosperous image of China in Siam in a day although Siam gather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political turmoil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mid intense human traffic between Guangzhou and Bangkok. The officials who took part in the Siamese tributary mission in 1843 were impressed by the grandeur of rituals and diplomatic receptions in China but not by the political decline of the country. For further details of Siamese envoys' interest in the ritual aspect of tribute, see Masuda (2004).

<sup>&</sup>lt;sup>9</sup> Besides published sources such as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Great Qing and Secret Palace Memorial of each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unpublished document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and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Beijing are also useful.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genealogies of these families.<sup>10</sup>

# 3.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Other Siamese Subjects

The role of the constantly increasing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Thonburi and early Rattanakosin Siam has been chiefly explained through the distinctive economic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as agents of the Sino-Siamese junk trade and as tax farmers in the king's service. 11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were a source of paid laborers for Siamese rulers and this led to a gradual change i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which depended upon corvée labour of commoners.<sup>12</sup> It is now necessary to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since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former completely isol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latter. Besides, the common belief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 population was principally prescribed due to their dialect groups might lead us to neglect the fact that each Chinese immigrant often conducted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casual circumstances they encountered in their actual lives. To explore these aspects, unpublished Siamese documents which record Chinese disturbances and disput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ere involved will be utilized.<sup>13</sup> To clarify the context of these events, the Three Seals Code is also examined since it provides fundamental knowledge on the subject of human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pre-modern Siamese society.

 $^{10}$  For a discussion of genealogies of Chinese families, see for example, 吳(1985), Suehiro (1989: 71-90), Kanitha (1991).

<sup>&</sup>lt;sup>11</sup> O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its economic impact on Siam, see, in particular, Nithi (1984: esp. ch. 3).

<sup>&</sup>lt;sup>12</sup> Akin shows that being outside the system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Chinese could fully engage themselves in these economic activities unlike other subjects such as Mon, Khmer or Lao who were marked for corvée (Akin 1996: 193-194, 218).

<sup>&</sup>lt;sup>13</sup> These types of incidents, especially after the 1830's, can be observed often in unpublished Siamese documen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Bangkok.

#### 4. Siam and the Chinese Networks Which Crossed Boundaries

Amid busy seaborne traffic between Siam and China during the heyday of the junk trade, some of the Chinese in Siam, who had a radius of activity not limited to the ruling territory of the kingdom played roles as the channels for Siamese rulers to know diplomatic situations i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s. It is well known that Western intelligence was the source for deepening the grasp of the world order for the Siamese ruling class especially after the 1820's. Ye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up-to date news of the changing political ord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learned from the Chinese afforded Siamese rulers a wider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Thus,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Chinese networks developed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 explain what sort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was transmitted to Siamese rulers and how it exercised influence on their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Among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Siamese sources, testimonies of Chinese traders will be helpful to investigate this topic. Records kept by Western diplomats, traders and missionaries who visited these areas will also be utilized since some of them recount their encounter with the Chinese, especially when they were onboard. Besides, it is important to work together with scholars who investigate the topic of the popul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ir networks crossed boundaries.

#### References

- Akin Rabibhadana. 1996. *The Organization of Thai Society in the Early Bangkok Period, 1782-1873*. Bangkok: Amarin. (reprinted)
- Cushman, Jennifer Wayne. 1993. *Fields from the Se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wao Seiichi. 1963. Reopening of the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Siam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Acta Asiatica*, 3: 1-31.

#### 224 亞太研究論壇第三十一期 2006.03

- Kanitha Thaitaechawat. 1991. Botbat khong khunnang thai chuasai chin nai phrathet thai samai ratchakan thi sam thung ratchakan thi ha haeng krung rattanakosin. M. A.thesis,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 Masuda Erika. 2004. The Last Siamese Tributary Missions to China, 1851-1854 and the "Rejected" Value of Chim Kong in *Maritime China in Transition* 1750-1850, eds. Wang Gung-wu and Ng Chin-keon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Nithi Aeusrivongse. 1984. Pakkai lae bairua. Bangkok: Amarin.
- Sarasin Viraphol. 1977.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uehiro Akira. 1989.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ailand 1855-1985*.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 Thongchai Winichakul. 1994. *Siam Mapp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oby, Ronald P. 1991.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吳翊麟。1985。《暹南別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莊吉發。1975。〈暹羅國王鄭昭入貢清廷考〉。《大陸雜誌》,51(3):126-141。